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9 期（总第 357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19 年 9 月 5 日

◆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郭书田（1）

◆ 重新发现乡土……萧　放（8）

◆ 乡村振兴从哪里入手……蒋高明　原　寒(11)

◆ 2019 年在四川农村的见闻……伍　国(18)

◆ 温铁军：踏遍乡村心未老……郑心仪(22)

◆ 关于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探讨……朱丕荣(27)

◆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与重大贡献……刘明国(29)

◆ 创新驱动 智慧兴农 全力开创数字农业发展新局面……周士良(33)

◆ 如何加强农民技术培训 深化农业技术推广……李民芳　蒙江平(35)

◆ “睦邻四堂间”：一种远郊闲置宅基地的活用模式……纪晓岚　金铂皓(37)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

——回顾 70 年来粮食生产发展过程

郭书田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农业的基础，也可以说粮食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特殊产品（我国粮食的概念包括薯类与豆类，国际粮食的概念是指谷物。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实际是食物与农业组织）。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发展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70 年来，粮食生产成就很大，有目共睹，经验不少，需要总结，面临问题不能小视。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回顾粮食生产发展的历史，以史为鉴，始终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具有重大意义。

（一）

我在童年时期，曾经目睹因灾全家逃荒流落他乡的境地。据老人告诉我，在民国十八年（1929 年），因大旱重灾，造成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饿殍载道的悲惨局面，令人难忘。“东亚病夫”的恶名，虽有对中国人民侮辱之意，但也反映了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病痛，饥饿是最为突出的表现。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戊戌变法的康有为、辛亥革命的孙中山都曾为改变这种局面而奋斗不息又屡遭失败。自从有了共产党，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经过 28 年坚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党领导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废除了两千多年以来封建的土地制度，解放了生产力。接着不失时机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虽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失误中，农民深受其害，但农民为了生存，顶住压力，仍能坚持生产，保证了城市居民基本口粮的供应。改革开放以农村为突破口，农民冒着风险，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禁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使粮食产量持续上升。自 1949 年至 2018 年的 70 年中，人口由 5.4 亿上升为 13.9 亿，增长 1.5 倍；粮食播种面积由 15 亿亩上升为 17.5 亿亩，增长 16.7%；粮食亩产量由 68 斤上升为 375 斤，增长 5.5 倍，粮食总产量由 1 亿吨上升为 6 亿吨，增长 5 倍；人均产量由 400 斤上升为 842 斤，增长 1.1 倍。由此看出，总产量的大幅增加，主要是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说明粮食生产的巨大潜力。我们以占世界 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的人口，使 7 亿贫困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这使在新中国成立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对华白皮书》中声称中国没有哪一个政府、包括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能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断言不攻自破。

70 年来，粮食生产的发展过程是有起伏的，大概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 1949 年至 1958 年，粮食总产量由 1 亿吨上升为 2 亿吨，增加 1 亿吨的时间为 9 年。

第二阶段自 1959 年至 1978 年，粮食总产量由 2 亿吨上升为 3 亿吨，增加 1 亿吨的时间为 20 年。

第三阶段自 1979 年至 1984 年，粮食总产量由 3 亿吨上升为 4 亿吨，增加 1 亿吨时间为 6 年。

第四阶段自 1985 年至 1996 年，粮食总产量由 4 亿吨上升为 5 亿吨，增加 1 亿吨时间为 12 年。

第五阶段自 1997 年至 2012 年，粮食总产量由 5 亿吨上升为 6 亿吨，增加 1 亿吨时间为 18 年。

第六阶段自 2013 年至 2018 年，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保持在 6 亿吨以上。

根据常情，每增加 1 亿吨的时间，由于基数增大自然会延长。但是也有例外，1984 年的粮食总产量由 3 亿吨达到 4 亿吨，只用了 6 年时间，而与 1978 年粮食总产量由 2 亿吨达到 3 亿吨，用了 20 年时间相比，基数大而增加 1 亿吨的时间反而缩短了 14 年，这也可以说是改变常轨的奇迹，被誉为“黄金时代”。需要作科学的分析。

粮食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生产过程，增产或减产，既有气候因素，又有政策因素。在增产时一般认为：一是政策好，二是人努力，三是天帮忙。为什么基数大增加 1 亿吨的时间反而缩短了？主要是由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亩产量由 1978 年的 168 斤上升到 1984 年的 240 斤，当时分析其原因有：一是土地包干到户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二是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水稻与玉米杂交优良品种的推广；三是化肥的大量投入，在“文化大革命”中，引进了国外 13 套年产 30 万吨合成氨化肥设备投产；四是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老本，包括“大跃进”中兴建的保留下来有效的水利工程与农业学大寨在丘陵山区修筑的梯田，减少水土流失，以及气候正常等多种因素。其实最为重要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体现价值规律的粮食收购价格政策，即在定购价提高 30%的基础上超购加价 50%，使农民大幅度增加了收入。特别是“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花钱靠借债），无定购基数，收购粮食全部为超购加价的收入，超购的越多，农民收入增加的越多。这是粮食生产“超常规”发展的第一因素。

但是，由于对 1984 年粮食大丰收出现“卖粮难”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于是在 1985 年调整了收购价格，改为“倒三七”（三成为平价，七成为超购加价的平均加权价），大幅度减少了农民种粮的收入，导致粮食大减产，播种面积下降 6060 万亩，亩产由 240 斤减为 232 斤，总产量减少 564 亿斤，下降 7%，人均产量由 390 斤减为 361 斤。这是在气候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的大减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但是对于这一情况缺乏实事求是的正确分析，认为减产原因有三：一是天灾不可避免，二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必要，三是部分地区忽视粮食生产。回避了价格政策的因素，这实际上是对违背价值规律的“惩罚”。由于出现了粮食生产数年的徘徊，直到十三届五中全会才重新评价为是对 1984 年粮食丰收估计过于乐观而采取了不适当的政策措施，导致了 1985 年的大减产，作了自我批评。这次一正一反的经验说明，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的道理；同时也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一面镜子，实践是判断我们政策正确与否的试金石。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采取了一些微调的政策，如与粮食定购任务的“三挂钩”（化肥、柴油、预购定金），使收购价格略有回升，从而使粮食生产也略有回升。价格政策的微调与粮食产量的微升，呈正相关系十分明显。但是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高层领导中出现了分歧，认为 1985 年粮食大减产是由于包干到户政策造成的，是方向道路问题，主张在农村重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拟出了文件。因反对之声强烈，未能成行。对此，我在 1990 年写了一本《中国粮食：多角度研究与思考》，由农业出版社发行，对粮食的这次波动作了分析，为研究总结经验提供了史料。

（二）

粮食购销制度的演变过程，正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两者是紧密相连的。粮食购销制度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 1949-1952 年，粮食是自由贸易的，市场主体是私营粮食企业。第二阶段是 1953-1984 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鉴于在自由贸易中，一些不法私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扰乱市场，影响粮食安全，同时为了保证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采取了由政府统一收购。农民除了“三留粮”（口粮、种子粮、自养禽畜的饲料粮）外的余粮，然后在城市按人口实行凭票供应定量的口粮。与此同时，实行了城乡分割的两种户籍制度，形成二元的社会结构。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第三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中 1985-1987 年，将统购改为“双轨制”，即合同定购一部分，市场议购一部分，也就是人们说的“死一块，活一块”，在购销体制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第四阶段是 1998 年以后，粮食的收购同步放开，由于每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城市销售价格不动，出现财政补贴不断增加。后在逐步提高城市工人工资水平中实现了购销同价，具备了放开购销价格的条件，使购销同步走向了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反复，如在 1985 年粮食大减产以后，把“合同订购”改为“国家定购”，强调了农民完成定购计划既是任务又是义务；但不久在粮食产量上升时，恢复了市场定购，完成了由统购统销转为市场购销的过程。政府的宏观调控由行政手段为主转为以经济手段为主，购销价格由市场的供求变化形成，政府采取最低收购价与保护价等政策，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

粮食虽然是一种特殊产品，除了经济功能外，还肩负着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功能。但毕竟是具有商品的属性，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改革开放以后的实践证明，在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结束了按定量供应粮食的统购统销历史。从此以后，粮食产量就像爬山坡一样，每上一个 1 亿吨台阶，就会出现几年的徘徊时间。1996 年，在经历 12 年之后由 4 亿吨上升到 5 亿吨，但在 1997 年下降为 5 亿吨以下，1998 年与 1999 年回升到 5 亿吨以后，从 2000 年起至 2006 年连续 7 年徘徊至 5 亿吨以下。2006 年 6 月 12 日，我与几位研究粮食问题的专家，给温家宝副总理与朱镕基总理写了一份《关于改革粮食流通体制与价格政策的报告》，就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收购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个问题提出改革的建议。他们做了批示给国家发改委王春正研究，计委批给调控司与法规司抓紧组织专家研究。到 2007 年，粮食产量恢复到 5 亿吨，连续 6 年达到 5 亿吨以上，在 2013 年达到 6 亿吨，至 2018 年保持在 6 亿吨以上，出现了自 2006 年至 2017 年连续 12 年增产的良好局面。

走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短缺经济”的困境，“短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记得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由于天灾人祸，全国出现了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的局面，不少地方发生了浮肿病的人群，需要加以适当照顾。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减少粮食定量指标，并采取干稀搭配、粗细搭配的颁办法，渡过难关。那是用的粮票由两种：一种是全国粮票，最大面额为 5 斤，供流动人口使用；另一种是地方粮票，最小面额为半两（上海）。粮票也成为亲友之间互助调剂的办法。有的饭馆买煮红薯，不要粮票可带着孩子去吃。在楼前有几平方米的空地，也要种点红薯或玉米作营养补充，未发生浮肿病。

在充分肯定粮食生产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看到出现的错误，特别是在“大跃进”

中的错误，从中吸取教训。一是把粮食的“统购统销”政治化，认为反对“统购统销”就是右派，就是反革命，伤害了不少知名人物。二是把国家定购粮食扩大化，除征购余粮外，还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征购“过头粮”（口粮），导致非正常死亡的悲惨事件。1959 年全国减少人口 447 万，1960 年减少人口 1692 万（国家统计局）。三是在“大跃进”中刮浮夸风，放粮食“卫星”，从河南遂平县嵖岈公社放出的冬小麦第一个“卫星”亩产 3200 斤到青海格尔木放出的春小麦 8000 斤的“卫星”，产生了弄虚作假的恶劣风气。四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办公共食堂，倡导“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饱饭”，造成粮食的极大浪费。五是以粮为纲，砍树开荒，毁草开荒，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六是在农业学大寨中，把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过渡到生产大队（“穷过渡”），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农贸市场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砍掉等。这些错误在 1962 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后，逐步予以纠正，特别是 1970 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的北方农业工作会议，坚持按人民公社 60 条办事，稳定了农业形势。

（三）

中国既是粮食生产大国，又是消费大国。当今粮食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不能掉以轻心。主要反映在粮食的供给不能满足随着人口的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对粮食的需求。不仅是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距离“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还相当远，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解决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是生态环境问题。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中国已经进入建立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新阶段。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在治理生态环境上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包括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以及生态农业县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积重难返，局部有所改善，总体还在恶化。粮食的“十二连增”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的代价的，最突出的是农业的面源污染与土壤的重金属污染甚为严重。以占世界 9%的耕地，使用了占世界 30%—40%的化肥，而使用有效率仅为 30%，不仅污染了环境，还增加了成本，造成增产不增收。对粮食生产虽然采取了四项补贴（面积、良种、化肥、农机），而由于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升，增加的支出基本抵消了补贴增加的收入。如果把劳动力支出加入到成本中，种粮是负效益。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农业部提前实现了化肥与农药的“零增长”，但由于存量的基数太大，解决起来难度很大。中央提出在“十三五”期间，生态环境由“局部改善，总体恶化”转变为“总体改善，局部恶化”的局面，还要付出极其艰辛的努力。

二是粮食效益问题。在工业化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国家采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斯大林对此称之为“超额税”），为工业提供了巨额的原始积累（9494 亿元），农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使显性的“剪刀差”有所减弱，而隐性的“剪刀差”仍然严重，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仍居高位，最高为 2009 年达到 3.33:1。2018 年下降为 2.68:1，仍高于 1978 年 2.5:1 与 1984 年 1.7:1 的水平。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不但未能同步实现农业现代化，而且出现了新的“三化”（农业副业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以及三大留守群体（老人、儿童、妇女），提出由谁来种地的问题。农民突破户籍的限制，自带口粮进城务

工经商，有 2.8 亿农民工由“世袭农民”变为“两栖农民”，在十分艰辛的条件下，获得了工资性收入，在家庭收入中超过了种地的经营性收入，尤其是粮食的收入微乎其微。从中可以看出，90 年代中国经济双位数的高速增长，是以廉价的劳动力红利与土地红利支撑的。1991-1995 年，全国 GDP 年均增长率为 11.8%，农村的贡献为 8.18，占 68.94%，而城市的贡献为 3.62，占 31.6%。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已不是农民的主业。中央提出在“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下，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成适度的规模经营。由于农民惜地心理，流转速度很慢，至今只有不到 40%，包括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合作社等新型主体，需要对他们加大扶持力度，提高种粮的收益，使他们的收入不低于务工经商的收入水平，确保粮食安全才会有可靠的制度保障。2005 年中央决定取消农民一切税费高达 2800 亿元，受到农民的欢迎，结束了 2000 年以来农民交皇粮国税的历史。

三是粮食大量进口问题。由于分户的经营规模小，被称之为“超小型农户经济”。在 2.4 亿农户中，户均土地只有 6.7 亩，尽管运用优良品种等技术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但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率很低，基本处于自给半自给状态，农业缺乏竞争力。我们虽然根据 WTO 的黄箱与绿箱政策，对粮食生产给以外补贴，但杯水车薪微不足道。在国际化、市场化大潮中处于劣势地位，外国粮食长驱直入中国。近几年粮食进口量（包括大豆与谷物）高达 1 亿吨，相对于国内产量的 1/6（大豆为 9 倍），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对国内粮食生产冲击之大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日本大米、俄罗斯的小麦已进口到中国。有人认为，进口粮食等于进口国外的土地、水、良种、化肥，以及政府的补贴，何乐而不为？错矣！不敢苟同。中国是人口居于世界第一的大国，而不是新加坡。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一旦出现全球性灾荒，或发生战争，粮食常成为产粮国外交斗争的工具，扼制进口国，手里存有多少外汇也买不进粮食，这已为历史经验所证实。这种惜售情况在国内地区之间也曾出现过。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北京粮食局长带着调入粮食的手令去某产粮省无果，空手而归，甚感无奈。目前，全球尚有 8 亿饥饿人口，而粮食贸易量只有 2～3 亿吨。中国大量进口粮食，会对世界粮食危机增加砝码。使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前几年，在美国、德国先后发生中国人抢购奶粉的丢脸事件，使当地居民恐慌不安。对此我们岂能不痛心疾首而坐视，作为农业战线工作多年的人，不能不为此“内疚”。为了应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商业部部长胡平、副部长白美清的组织领导下，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合作，在郑州建立了第一个粮食期货市场（杜岩、段应碧与我参加），运用期货价格调整国内市场。由于中国是个产粮大国，对国际粮食市场影响甚大。一次预计夏粮减产，芝加哥交易所的粮价立即上涨（实际上未减产），这说明中国打一个喷嚏，那里就会患一场感冒。在全球进入国际化、市场化大潮中，我们更应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把粮食立足于国内基本自给，进出口作为品种与余缺调剂，以此作为基本方针，不能动摇。值得欣慰的是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在改革开放中，建立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体制，粮食生产有了巨大发展，仅“北大荒”垦区拥有 4000 万亩耕地，年产 400 多亿斤粮食，商品率 95%以上，能够满足京津沪三大市、海陆空三军、陕甘宁缺粮省区，以及港澳特区对粮食的需求，成为确保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他们在农业“走出去”中，与外国合作建设商品粮基地，发挥了“排头兵”作用。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防御不测，谭振林、李先念两位副总理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派农垦部副部长萧克将军去“北大荒”垦区调储备粮，如期调运到目的地，做到有备无患。

（四）

中国是农业立国的国家，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成为东方农业文明发源地之一，与西方的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并驾齐驱领跑世界文明，形成“东方先进，西方落后”的局面。科学史学者李约瑟说，中国已经使用铁器，而欧洲还处于黑暗时代。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而中国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状态，落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在农业方面的先进技术也开始输入中国，突出的有三项：一是遗传育种技术，二是矿物营养技术，三是农业机械技术。使传统农业发生了变化，但进展缓慢。在传统农业中，粮食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流传下许多具有深刻哲学理念的民谚，传播至今，千古不朽。例如：“仓廪足天下安，衣食足知荣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粥一饭当思之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祈求“龙王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在战争年代“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三字经》中说的稻、粱、粟、麦、黍、稷已在甲骨文及《诗经》《山海经》《礼记》《尔雅》均有记载，是中国粮食之源，也是养育中华民族之根。经考古发现，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种植籼稻化石，已有 7000 年的历史，比文献记载推前 2000 多年；内蒙古赤峰敖汉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种植粟（小米）的化石，已有 8000 多年的历史；安徽亳县出土的碳化小麦种子，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在全球 150 多个小麦品种中，中国占一半以上；在甘肃、陕西一带的文化遗址出土的菽（大豆）化石，已有 7000～8000 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是大豆的原产地。中国从寒温带到赤道热带的气候地理条件，是最大的生物基因库，也是粮食作物的基因库。一些原产中国粮食作物的栽培技术，如稻田养鱼等已列入世界农业重要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包括 100 万亩的耕地、草地、林地，还有大面积的荒漠地、盐碱地、以及水域，在丘陵山区多种木本粮食与木本饲料，在牧区多种草食动物，而不能解决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自给问题，不论有千条万条“理由”，是说不过去的，无法告慰我们的祖宗，对此值得深思。明代皇帝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泽东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与“备战备荒为人民”有异曲同工之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等，都要落到实处，包括主产省与主产县增加调出量，缺粮省与缺粮县减少调入量，增加供求平衡的省与县，把战略目标与战术措施统一起来，增强抵御自然与市场风险的能力，使产粮大国变为产粮强国，使各族人民都能有真正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上到下都应有这样的自信。

粮食的贸易战实际上是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进出口贸易是“战力”强弱的表现。我们要把失去饭碗中的食物再夺回来，由进口大于出口的逆差转为进出平衡或出大于进的顺差，是一场攻坚战与保卫战。我们依靠自己的资源、资金、技术以及劳动力的优势，为夺取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切身利益贸易战的决定性胜利奋斗到底。

注：2016 年编印了一本《中国粮食问题研究文集》，收编了作者自 1986 年至 2015 年 30 年撰写的 73 篇文章，2016 年-2018 年又写了 4 篇，合起来共 77 篇。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2019 年 3 月 20 日）

附：

1949-2018 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与人均产量表

年 份	总人口（万人）	播种面积（万公顷）	单位面积产量（公顷/公斤）	单位面积产量（亩/公斤）	总产量（亿公斤）	人均产量（公斤）
1949	54167	10995	1027	68	1132.0	208
1958	65994	12761	1567	104	2000.0	303
1978	96259	12058	2527	168	3047.7	319
1980	98705	11723	2734	182	3205.6	327
1984	104357	11288	3607	240	4073.0	390
1985	105851	10884	3483	232	3791.1	361
1990	114333	11346	3933	262	4462.4	393
1991	115823	11231	3875	258	4352.9	378
1992	117171	11056	4003	266	4426.6	380
1993	118517	11050	4158	277	4564.9	387
1994	119850	10954	4063	270	4451.0	374
1995	121121	11006	4239	282	4666.2	387
1996	122389	11254	4483	298	5045.4	414
1997	123626	11291	4376	291	4941.7	402
1998	124761	11378	4502	300	5123.0	412
1999	125786	11316	4492	299	5083.9	404
2000	126743	10846	4261	284	4621.8	366
2001	127627	10608	4266	284	4526.4	356
2002	128453	10389	4399	293	4570.6	357
2003	129227	9941	4332	288	4307.0	334
2004	129988	10160	4620	308	4694.7	362
2005	130956	10427	4641	309	4840.2	371
2006	131448	10506	4740	316	4980.4	378
2007	132129	10566	4746	317	5014.8	399
2008	132802	10670	4950	330	5285.0	397
2009	133474	10897	4871	324	5308.2	398
2010	134056	10987	4973	331	5464.0	407
2011	134700	11057	5166	344	5712.0	425
2012	135300	11067	5325	355	58591.1	435
2013	136100	11195	5376	358	6019.4	412
2014	136782	11273	5385	259	6070.9	443
2015	137462	11333	5495	366	6211.4	451
2016	138270	11302	5835	389	6604.0	477
2017	139008	11220	5895	393	6616.0	475
2018	139538	11703（175555 万亩）	5625	375	6579.0（13258 亿斤）	471

注：本表格为补充修订稿，补充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介绍，国家统计局根据三次全国农业普查，2016 年与 2017 年粮食总产量有所调整。2016 年由原来公布的 6162.4 亿公斤调整为 6804.0 亿公斤，2017 年由 64791.1 亿公斤调整为 6616.0 亿公斤。

重新发现乡土

萧　放

乡土是民俗学原初而经典的研究对象，乡土是研究中国民众文化之根的基础。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远离乡土，乡土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为逐渐消失的历史的背影，我们主流社会甚至一度将其视为封建落后必须予以根本改造的对象，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人持此观点。但是，与之相反，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逐渐失去乡土的时候，出现强烈的怀乡情绪，乡愁成为当今社会怀念乡土的一种表达。城市化过程中回不去的故乡才是乡愁发生的对象。

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与经济全球化、后现代思潮出现叠加，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人返回乡土、返回田园，返回的动机、方式、路径虽各不同，但构成了一股返乡的潮流，潮流的精神动力是乡愁，但不能忽视的物质动力是资本下乡，一些企业家在乡村寻找商机，寻找发明传统，以文化经济的方式，复兴乡土社会。重新发现乡土价值，振兴乡村日渐成为当代社会的共识。

一、返乡成为时潮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返乡的大约有三类人：第一类是为纾解城市病的困扰与寻找乡野新鲜生活的城市普通人，他们是乡村的观光者，他们是回归乡土的主流人潮；第二类是寻找传统文化资源的学者、知识分子，他们从城乡协调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角度考察乡村，虽然其中有各自的追求与工作任务，但目的是重新肯定乡土的价值，提供振兴乡村的思路与方案。政府部门与专家学者合作，评估乡土村落的价值，依照空间形态与生活价值进行选择性的保护，确定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等名录；同时根据乡村经济文化特点，寻找乡村脱贫与致富之路。第三类是寻找资本利润的城市企业家，他们看到了乡土生活的商机，将城市闲置或者利薄的资本转移到乡村，以此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传统乡土产品的生产与市场推广，服务乡村旅游的民宿经济等，正成为吸引社会企业关注的热点。三类人汇成返乡的重要力量，形成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景观。可能还有第四支队伍，那就是政府的美丽乡村建设工程，但这属于政府推动，民众自己进行的工作。与返回乡土的身体移动的同时，21 世纪初，中国开启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将传统农业文明的优秀成果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保护。数千年农业文明累积的乡土文化，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已经变成文化资产，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进步。

在全球化背景下，乡土在变化，虽然速度有快有慢，程度有深有浅，我们看待乡土的眼光也在发生变化。在现代社会，乡土正在被重新认知、重新定义。乡土成为与城市对照的镜像。我们对于乡土的认识与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论述的乡土情形已经明显变化，但我们继承了费先生对于乡土以及生活在乡土上的那群人的情怀与文化理解。

二、重新发现乡土的现代价值

我们重新认识乡土，是在寻找乡土的文化基因与文化个性，发现乡土中曾经被遮蔽但有助于现代社会建设的物质价值、社会价值与精神价值。

首先，乡土是特定的地域空间，它与城市相区别，具有特定的物质价值。物质的乡土是承载山水、土地、森林、动植物等有机物与无机物的特定地理单元，它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乡土这一地域空间中，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人密切结合，休戚与共。特别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土地不是外在的，土地是人的“无机身体”，土地都有名字，甚至都有故事，人们对于世代耕作的土地怀有深深的情感。土地是村民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是模塑乡民性格、性情与生活态度的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农民“风尚、性格等依地块而各不相同”，乡民的风尚、性格因不同的风土有不同的呈现。人与大地的紧密依存是乡土文化最本质的特征。土气是文化性格，也是生命力的源泉。乡土中人的生存方式与城市迥异；其次，乡土是一种社会存在的生活样态，乡土是一种社会结构方式，具有特定的社会团结参照价值。乡土中的人依照村社或者家族生成社会关系，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关系位置与历史系列之中，相互关联，相互依赖与扶持。他们世代如斯，熟悉历史、熟悉当下，以人情作为社会的胶合剂，人情是相互扶助之情，是权利、责任与义务一体的利益之情。人们彼此之间的熟悉，让情感变成文化资产，可以横向扩展与代际传承，人们在紧密的社会联系中，使村落成员有稳固的结构位置，形成礼仪行为规范，如陕西蓝田乡约所规定，“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仪相交，患难相恤”等，乡民在村落共同体中，以道德、生计相互激励，以符合伦理的行为作为日常规范，以礼仪作为相互交往行为准则，以相互救助为公益目标，由此建立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

以乡贤为主导，以乡规民约为规范，以传统节日为共同时间，以集体参与的民间仪式为聚合机会，形成了内聚性的亲密的乡土社会。它与城市人以当前利益为中心的相互竞争与疏离的社会结构形成鲜明对照。

其三，乡土是特定精神状态与价值观念的载体，是我们重建生活美学与生活伦理的重要参照。柏拉图在《文艺对话集》中借大希庇阿斯与苏格拉底讨论美的定义时说：“美是善”，“美是恰当”，这种善与恰当，我理解为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和谐的生活状态符合美学的本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一种惯例和稳定的感受”，乡土以人地关系的和谐为基调，自然、宁静、平和、亲密是乡土精神状态的一般表现。乡土不需要标新立异。乐天知命，享受日常的乡土生命态度，对于奔波、焦虑的城市人来说，无疑是一份清醒剂。因此乡土成为离开乡土漂浮游子的乡愁意象。由此可以说，乡土对多数当代人来说，是一种精神意象，是现代人借以对现代生活对人的异化问题的批评。乡愁中的乡土是一种审美性质的乡土，是乡土文化的抽象。

但乡土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精神意象，那它只有认识价值与精神批判意义，而不会实际改变或者服务我们

的生活，如何将乡土的审美还原于日常生活，这是一批奔向乡村从事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人的理想，但这种理想往往由于我们对乡土的特性认识不足，而把乡村当作城市人短期放松休闲的乡野宾馆，从而失去了亲近乡土的本来意义。

三、如何活化传承乡土价值以促进乡村振兴

乡土，既不是与现代社会悬隔、落后时代的传统保留地，也不是抽象审美的乡愁寄托之区。乡土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乡土有自己的本质属性，有自己社会运行逻辑原则、秩序体系与审美趣味。

乡土的生活方式是人们在世代生活的土地上逐渐生长与形成的生活惯习。围绕生活主体的需要，形成严密而温和的生计方式与生活秩序。乡土是自然的，它属于特定的自然风土，人们选择利用特定的生活资源作为生计内容，依照自然的，维持人群的生存与延续。乡土生计一般有农业、农副业与乡村手工业等方面，生活资源决定了它的生计方式。

乡土是物质生命的基础，是人类智慧最初发生的温床。我们在理解乡土时要充分理解人与风土的关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要明确养与被养的关系，理解此乡此土才具有的物质生活样态，这样我们进入乡土，试图对乡土重建与再造时就得遵循乡土生态环境与人们习惯的生计方式，可以对它们历史选择的生计方式进行复兴与扶持，进行扩大性生产，让地方风物特产，变成促进地方经济活力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与地方资源结合的乡土手工业与乡土艺术，如果我们对乡土技艺特色、乡土技艺传承方式与乡土技艺产品形态进行深入调研，结合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与传统风格式样，对其做必要的品质改良与技艺提升，并进行品牌设计与市场营销，将乡土民间手艺品变成市场上的日用消费品或旅游商品，这是活化复兴传统乡土技艺的现代途径。这样的技艺传承实践，既不离乡土，又提升了乡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方向。

乡土的生活秩序对在现代社会城市生活的人来说，同样具有提示与比照的意义。乡土生活秩序与时空文化设置依循的是自然时间秩序与人伦原则，人们依照四季节律安排生产生活进程。乡土的人文时间紧密地依靠着自然节气时令，岁时节日、人生仪礼、祭祀信仰无不与春秋时令性质相关。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乡土社会自然而然。同时乡村的和谐基础还基于人伦原则，忠孝、孝友、孝义这些人伦概念是乡土社会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孝敬长辈、友爱亲邻，人们互助互惠，乡土共同体的亲密感觉，让人们感受到相互依存的温暖。这对于人际关系日益疏离的现代人来说，具有反思的参考价值。我们能否在现代合作理念下，重建拟乡土亲密的人际关系，是值得思考的。

总之，乡土在现代社会是一个独特的空间，20 世纪 40 年代费孝通先生讲当时的乡土有点飞不起来的样子，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乡土的时候，觉得它具有独特的认知价值与文化意义，乡土有自己的秩序与美感，有自己的人情礼俗，有自己的清洁观念，有自己的乡土艺术。觉得本来乡土文化就是土生的文化，不需要飞上天，天上也未必好，还是依存大地，踏实温暖。

（来源：《国土资源》杂志社）

乡村振兴从哪里入手

蒋高明　原　寒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 2 月 4 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竞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系列重要指示与行动，预示了中国将要对人口占半壁江山，但居住的面积远大于城市的乡村进行重大改革，中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或将从乡村振兴开始。

一、在家门口就业是硬道理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普查登记的大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6.65 亿人，占 49.6%；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6.74 亿人，占 50.3%。不难看出，即使经历了城市化，居住在乡村的人口还是超过了城镇。长期以来。由于城乡发展不平衡，一些地区出现了“城市像欧洲，乡村像非洲”的不和谐局面。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切实解决好农民的就业问题。由于农业不挣钱，农民纷纷撂荒进城去打工。目前的严重形势是，年轻人根本就没有将农业作为一种能够养家糊口的职业。“七零后不愿意种地，八零后不会种地，九零后不考虑种地”，从事农业的农民平均年龄 57 岁以上，农业变得后继无人；食物供应对国际市场依赖性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信号。

在我国长期的发展历史进程中，农业都是很受人尊重的职业。在“士农工商”这个顺序中，农民在知识分子之后，前者靠脑袋吃饭，后者靠力气吃饭，而农民的后代也会通过科举进入前一列。遗憾的是，今天严重的城乡差别造成的就业机会不均等，农民纷纷进城去打工。城市里有钱挣，随便工作一周就将一亩地的种粮收入赚来了。农民进城去打工，家里的土地不能好好经营，装修很好的房子，只有春节期间作为度假旅馆使用几天，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当务之急是要让农村有人气，农业成为受人尊重的产业，从源头解决“空心村”问题。解决就业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创造机会让农民尤其年轻人在家门口就业。

2018 年中央一号文指出：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工程，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风文明是保障，治理有效是基础，生活富裕是根本，五者统一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要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一切都要求乡村有就业机会，而这些就业是与乡村

的特点相适宜的，是农民熟悉的，如优质安全食品的生产，食品加工，食物运输与销售；乡村环境治理，绿化美化，乡村旅游等等。我们认为，乡村振兴首要任务是要给农民在家门口创造就业机会，围绕着优质安全的食物生产做文章，围绕农业以此发展加工业、商业、银行、教育、旅游、文化、养老、保险等等产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拓宽增收渠道。

二、生态农业是重要抓手

从理论上讲，地球上任何光合产物及其衍生物，只要有了种子、孢子、受精卵或其他动植物繁殖体，都可以转变为人类所需要的食物，从而告别目前人类为生产食物所发明的数万种化学物质，这一理论的成果就是生态农业。围绕食物链，人类已经发明了 50626 种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包括饲料、肥料、农药、地膜、激素、食品添加剂等等，部分具有致癌作用。其实，在生产源头，不使用任何农药和化肥，不用除草剂和激素，仅施入动植物排泄物、枯枝落叶、菌床或菌棒废弃物、餐余等天然有机物，所生产出的食材就是符合中外有机认证标准的安全食品，这样的食品在市场上有很强的竞争力。生态农业是高效的，可带动农民在家门口就业，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

很多人走的农业路子其实是美国式的懒人农业，以集约化、规模化、化学化为主要特征，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温室气体升高，食物安全存在很多隐患。这样的农业需要人工少，恰好不能留住人。我们要反道而行之，发展优质的高效生态农业。由于国际农产品竞争的结果，我国从事传统农业已经很难给农民带来合理的收入。农民单靠那一亩三分地，难以过上体面的生活。大城市里，家装用的沙子可卖 2 元/斤，超市矿泉水售 2-4 元/斤。当沙子比粮食贵，水比牛奶贵的时候，严重扭曲的市场经济，对传统农业带来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农民纷纷进城打工，“空心村”出现，是对上述市场经济模式的无奈选择。怎么来振兴呢？发展生态农业是根本出路。

2014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组团考察美国的规模化农业，本文第一作者曾与美国农场主面对面交流过。美国农场主拥有的土地，多的可达一万英亩，合 6 万亩土地。他们每亩能够挣多少钱呢？折合人民币就是一百多块钱，6 万亩耕地就是 600 多万，合 100 多万美元，政府还有 40%的补贴，他们还会向政府交税。每年收入 100 万—200 万美元，日子肯定比城里人好。但美国土地广袤，可以休耕，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的农民根本做不到。我们也有一种类似美国的规模化农业模式，就是中国的农垦，机械化水平毫不逊色。呼伦贝尔的土地是国有的，有 4 万平方公里草原或农垦地，土地不需要交租金，但他们经济效益仔细核算起来，种植的话大概一亩地 200—300 元的样子，规化种植小麦或者玉米之类的作物；草原畜牧业效益更低，不到 100 元/亩。

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地农民种植单一化作物，如果不算劳动力成本，有 500—600 元/亩纯收入就算不错了。要是五口之家，依靠种地挣钱，每年要有 5 万—10 万元收入，必须有 100—200 亩耕地，凑起来是十分困难的。目前如果农民进城打工，小两口辛苦一年. 收入 5 万—10 万元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就是脏、苦、累点。目前农民工工资上涨很快，个别工种早已突破 500 元/天关口。农民工收入高于大学生甚至硕士生、博

士生早已不是稀奇的事情。貌似农民打工收入很高，但家庭与社会成本很大，孩子缺乏父母的照顾，或夫妻分居，老人没有人照料，其中的心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我们现场考察过很多农村，了解农民的需求，他们纷纷表示，要是在家门口每年 5 万—10 万的稳定收入（5 口人），他们不会进城去打工。然而，我们的农民既没有美国那么的土地，也没有国营农垦集团那样不要钱的土地，他们怎样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实现单位耕地面积的经济效益大幅度提升呢？

三、乡村必须美丽才能留得住人

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乡村是远早于城市的。人类最早以家族形式沿河、海、湖、草原、高山居住，从事的劳动是农业或畜牧业。通过读书、经商、从军、做官等渠道，乡人可进入城市，但很多人到老后依然愿意回归故里。“少小离家老大还”，古今“贺知章们”为什么对家乡有强烈的乡土情结呢？

第一，乡村远离城市喧闹，让人们安静下来。熙攘的城市，忙碌的身影，林立的高楼大厦疏远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距离，紧张、烦躁压迫着现代人的神经，于是“生态热”“休闲热”成为都市人的追求和渴望。今天，已拥有了辉煌工业文明的后工业社会，却正在失去与大自然和谐相依的优良传统。而与城市强烈对照的是，乡村田园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一望无垠的田野、纯朴的民风乡情、清新的绿色食品，这对城里人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吸引。优美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的软实力，更是硬实力。

第二，乡村是城市的营养池，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我国传统农业专注于土地，把发展的思路拓展到关注人——地——人和谐共存的更广阔的背景之中，这也正好契合了长期以来农民渴望脱贫致富的愿望。“天时、地利、人和”“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乡村向城市提供的不仅仅是基本的食物供给，还有中草药、花卉等等，既满足了国民物质上的营养需求，又满足了精神上的营养需求。

第三，乡村具有浓郁的人文情结，历史沉淀深厚。乡村多以家族居住，亲情味浓郁。村民不像城里人那样，连对门姓什么都不知道，而是互相熟悉，互相帮助，互相关怀的，他们生活在一个人情社会之中。其实，城市与乡村也有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加之“上山下乡”的历史经历，寻根的潜意识驱使市民寻找一个恰当的时机与方式，于是旅行社的“当一天农民”“插队落户”等项目一经推出，即产生了强烈反响。这些都说明，乡村的人文情结是普遍受到欢迎的。

第四，乡村是理想的养老之地。过去农村四世同堂或者五世同堂，其最高境界就是亲情养老，而不是依靠什么外来的力量。老人在家庭里起的作用也不只是等待别人来养活他，他们还能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如照顾儿孙、照看家庭，并在家里的大事上起决策参谋作用。另外，农村家庭还养殖很多小动物，这些都可以给老人带来快乐。人总是要死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一客观规律，“寿终正寝”是过去中国的死亡的最高境界。过去，农民家里如有老人去世，大家都忌讳说死这个字眼，而是用某某“老了”。老了，也就是了了，万事皆空。老人在儿女照护下坦然离开，回到黄土地，这才是真正的“安乐死”。如果恢复了农村养老功能，那些“少小离家”的就可以“老大回”。将乡村建设成别墅级的养老公寓，在那里让人去接地气，可为国家科学解决养老难问题。

很多人在理解美丽乡村时，却远离了生态要素。化学化、生物技术化的农业使得乡村到处充满污染、垃圾和杀机，无论如何这样的乡村是美不起来。乡村产业必须发展生态农业，才能构建美丽的乡村生态。生态农业，顾名思义生态环境要良好，生态在前，农业在后。在理想的生态农业环境条件下，农业中的各种元素是能够循环起来的，只有那些通过食物带走的元素，才通过合理施肥等措施来弥补，带走的越少补充的也就越少。对于害虫、病害和杂草的防治，要充分尊重自然的规律，能够让大自然解决的问题，不搞太多的人工干预。

农田是在自然生态基础上通过人类的努力改变来的，主要来自森林、湿地或者部分草原。有的改造时间漫长，如山东，河南一带的农田就利用了四五千年，有些则比较年轻，如东北的松嫩平原，只有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美国的农田历史大多在两三百年之间，远远低于中国的农业开垦历史。其实，如果仔细观测，农田中还保留着很多自然要素，如乡土树种、杂草、害虫、益虫或益鸟，部分大、中、小动物等，那些在偏远山区的农田自然要素更多。人类种植的谷物，如小麦、水稻、玉米等都是长期选育的结果；饲养的动物，如猪、鸡、牛等，是由野生动物驯化而来。除了人类可食的物种外，农田多样性越丰富，其系统越稳定。除此之外，农田湿地、本地森林与农田防护林、健康的土壤、没有农膜覆盖的自然农田等生态要素，必须在设计与建设美丽乡村中要充分考虑进去。

只有乡村美丽了，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且中国的乡村建设得会比欧洲、日韩的乡村还要漂亮，还要充满生机。

四、如何设计美丽乡村

美丽乡村不能按照城镇化的思路来搞，那些简单让农民上楼的做法忽视了农业活动的特点。乡村原本是与自然和谐的，乡村基本没有垃圾，餐余是动物的食物，动物的粪便是庄稼的营养，人类要做的是维护这种生态平衡。对于乡村设计，不是要将乡村推倒了重来，在村落基础上建城市，而是要把城市中合理的要素搬到乡村。乡村要干净、方便、接地气，乡村也可有微型公园、停车场、银行、学校、健身设施等。这样的乡村是可以设计的。设计中的美丽乡村应当包括下述要素。

第一，安全食品尤其是有机、绿色食品生产地。优质食品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关键是要解决生产与销售之间的矛盾，让消费者买到确实安全的优质食品，让优质的农产品有顺畅的销售、合理的回报。我们在山东平邑县建立的弘毅生态农场就是这样的乡村模型，我们完全不用农药、化肥、农膜、除草剂、添加剂和转基因（六不用），相当于国家认证的有机标准，或略高于其，其产品已经覆盖到大部分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样的生态农业，如果在全国开展起来，其效益是非常高的。

第二，乡村污水与垃圾处理系统。生态农业是最大的环保工程，土地对有机物就是天然的处理厂，河道里的沙子对少量污水有很强的净化能力。当前，由于农民不愿意多投入劳动，转而利用更多的化学物质，加上现有的国家对化肥、农药、农膜的补贴，农民可以用非常廉价的成本大量使用这些对土地和人体健康都有害的化学物质，而工厂生产这些物质造成大量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发展生态农业，仅保留了少量化肥，那

么可倒逼化肥厂农药厂农膜厂减量，而转为从事其他环境破坏小的产业，从源头减少工业的点源污染和农业的面源污染。

第三，乡村建筑设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居一方建筑。不同的生态环境下，乡村建筑都是与自然环境高度协调的，其风格各异。中国的乡村建筑原本是非常有特色的：北方的四合院，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西北的窑洞，西南的“干栏式房屋”，闽南的圆形“土楼”，堪称世界乡村建筑的典范，与西洋的乡村建筑各呈千秋。至于那些世家院落，乡村祠堂，道观与佛庙更使美丽的乡村增添了古朴的色彩。对于乡村建筑，有些需要新建，有些则不需要，仅在已有的合理布局基础上加固、装饰即可，修旧如新，使其保留传统风貌。

第四，植物景观设计要尽量用经济作物而少用城市园林植物。乡村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尤其经济作物、蔬菜、果树、中草药、淡水鱼塘等要素都可以于景观设计。如果乡村景观多采用经济作物，配置本地树木，则可以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景观价值双赢。

第五，社会服务设施。中国村镇成为最有活力的地方，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如果将城市好的要素（教育、卫生、医疗、学校、涉农产业、银行、旅游等等）向农村辐射，而不是简单将农民搬入城市，那么中国城市的居住压力也将相应降低。

第六，优质农产品加工与销售设施。城乡要真正良性互动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先富带后富”，优质农产品加工与销售就不能缺少。优质安全农产品是健康生命的第一保障。如果先富者带头消费农民辛苦种植的优质农产品，用市场手段鼓励农民用健康环保的技术生产食品，保护生态环境，则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先富带后富”。农二代及其农业大学生应当积极投入到这种可持续的行业中来，严保优质农产品质量，使得物流与货币流在城乡之间和谐流动，带动生态就业。

上述各个行业，都是以农业为主导，以人为本的，避免农产品过剩，生产优质食物并在家门口加工，储藏与销售，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实现城乡的互动，同时带动旅游业发展。

五、山东农村的实验

为了解决上述土地规模与土地效益矛盾问题，我们的科研团队，早在 2012 年前就开始研发一种“低成本，零污染、高回报”的农业模式。在该类农业模式下，农民投入的成本已降至每亩不足 300 元，其主要投入为劳动力，但实现了每亩 5000—10000 元左右的净收入，等于自己给自己打工。这个模式就是开始被人诟病、目前被众多消费者接受的“六不用”农业模式，即在种养过程中，不用农药、化肥、除草剂、地膜、人工合成激素与转基因种子，尽量利用可留种的老种子，生产优质食品，实现 3—5 倍效益提升。从几个示范农户来看，我们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部分超额实现。下面就来看看 10 个农户的收入情况：

农户甲投入 25 亩土地建了养牛场、青贮池、堆肥厂、污水池。常年投入两个管理人员，60 后夫妻档，临时用 3—4 饲养员。有母牛 100 头，大小牛 250—300 头，每年出栏 100 头左右，净收入 30 万—40 万元。这是个特殊的农户，要求的技术含量高，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一般农户较难胜任。

农户乙与弘毅生态农场常年合作，种植“六不用”粮食，主要为小麦、玉米、大豆、高粱、谷子、花生、红薯等。转租农场土地 40 亩，自投土地 10 亩。五口之家，70 后夫妻档，为村里的种植大户，有 70 马力拖拉机、收割机等。已是连续三年稳定年收入 15 万—20 万元之家。

农户丙投入土地共 10 亩，为 60 后老两口经营，主要种植“六不用”苹果、柿子、核桃、山楂、生姜、山药、毛芋头、各种顺季节露天蔬菜等。每年稳定收入 10 万元左右。该农民经营的“六不用”食材，以物种计，高达 70 种以上，部分野菜（如荠菜、马齿苋、蒲公英等）都有很好的市场。这种高土地利用效率，不破坏耕地且保养土地的效果，是工业化农业模式无法企及的。

农户丁以种植蔬菜和真菌养殖为主。准 70 后农民，经营土地 4.5 亩，严格按照技术要求，主要种植顺季节“六不用”蔬菜，如大葱、大蒜、洋葱、土豆、胡萝卜、大白菜、白萝卜、胡萝卜、红皮萝卜、黄瓜、西红柿、扁豆、鸡腿菇、香菇等蔬菜色三四十种。年稳定收入 10 万元以上。

农户戊由兄妹作业组组成，家有土地 10 亩左右，从事弘毅生态农业淘宝销售业务。80 后夫妻，加一个 90 后妹妹，还有他的老母亲为农场勤杂，月总工资收入 8300 元，年收入 9.9 万元。该组合的就业年轻化趋势十分明显，较高的农民工返乡就业率是乡村振兴的硬性指标。

农户己禽类养殖户。由 60 后夫妻组成，投入土地 6 亩，养殖鸡、鸭、鹅、山鸡及各种禽蛋，每年收入约 7.5 万元。所有禽类自由放养，水禽能够自由戏水，且为活水。

农户庚豆类与面制品加工户，4 口人，自有土地 5 亩，常年加工古法加工豆腐皮、豆腐、腐竹、豆芽等豆类制品，严禁使用防腐剂等化学物质。加工毛收入 8 万元，其他收入在 3 万元左右，年收入 11 万元。

农户辛 50 后夫妻档，2 口人，承包土地 20 亩，生态养殖猪 20 头。猪粪发酵后搞“六不用”作物种植，养殖与种植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

农户壬为接待来自全国各地来弘毅生态农场的游客，特开了生态食材餐厅，发展一户农民从事乡村旅游接待工作。3 口人，加上老人与孩子的土地 6 亩。目前，每年接待农场参观游客 8000 到 10000 人，人均消费 100 元，每年稳定注收入在 9 万—10 万元左右。自种土地也按照弘毅生态农场要求，种植小麦、玉米、花生、大蒜等。来农场参观与体验的客人食材，要求 95%以上为农场自产。

农户葵 3 口之家，80 后夫妻，有一辆物流运输车，承担物流工作，已基本不从事农业生产。弘毅生态农场的产品，已经覆盖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尤以京、沪、广、深高端客户为主，约 4000 名消费者，涉及数千个家庭。因物流业务量大，弘毅生态农场某物流农户组建的公司签订长期合作协议，该公司每天上门取货。年收入在 10 万元以上。

六、资金使用与制度保障

乡村振兴需要政府资金助力，需要科技投入。事实上，目前中央政府针对农村的资金不少，包括种地补贴、扶贫资金、医疗资金、环保资金、养殖补贴、农田改造、水利设施建设等等，但很多资金投入起到的作用有限，一些项目重复建设，使本来过剩的农产品继续过剩，例如反季节蔬菜，仅中国就生产了全球 70%的反

季节蔬菜，产生了资源浪费。

扶贫工作是国家的重要工程，应当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态农业的特点恰好是利用较多的劳动力。前面所述，地球上的一切光合产物，通过生态农业科技，都能够变成人类的食物，农村中这些光合产物也很多，如枯枝落叶，生态垃圾中的可降解部分，人粪尿，动物排泄物，河流中的青苔，屠宰的废弃物，底泥等等，将这些自然合成的有机物分拣出来，并运送到地里去，是个很简单的劳动。一方面为农田增加了养分，另一方面让乡村变得美丽起来。对于付出了劳动的贫困户，可以使用国家的扶贫资金扶持。还有一个工作是与扶贫有关的，即生态修复，表现在草原、森林、湿地、矿山废弃地的修复。种树，种草，养花这样的工作也需要人工。通过扶贫资金，将生活垃圾运往需要进行修复的地方，贫困户的劳动力就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退化的生态修复了，就能够很好地发挥生态功能，让乡村美丽起来，从而使国家生态扶贫资金与治理资金发挥有效的作用。

在制度建设方面，人才最关键。目前涉农的高等院校或科研单位，不愿意到田间地头，而是在实验室里造文章，或者到农村卖自家的技术，农民吃亏多了，客观造成农民对科技人员不信任。应将部分科研人员从现有的评估体系中解脱出来，鼓励他们到农村一线从事与农民脱贫致富、环境保护与健康食物生产与加工有关的技术研发，中央资金要向他们倾斜；对于领导干部，要组织好产学研对接，做好服务工作；对于从事农业技术、农资或农产品经营的企业，要诚信经营，不能搞坑蒙拐骗，玩套取国家资金游戏，对于坑农和造成消费者健康损害的不法分子，要予以严厉打击，净化农业商业环境。

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进乡村生态化、信息化、现代化。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对于农村集体土地或财产，实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并壮大集体经济。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结语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兴战略，就是要下决心解决这个几千年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乡村振兴必须留得住农民，必须让其劳动能力转化为收入，既有效配置了资源，还保护了农田生态环境；将农民的工作分类，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收入稳定。从事高效生态产业的农户，分工是明确的，种植、养殖、加工、销售、接待、物流等都有涉及，真正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在这个融合过程中，农户生产出了优质安全食物，食物链告别了有害化学物质。另外，围绕乡村治理、乡村美化与净化、乡村教育、乡村医疗与养老等产业，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科学使用中央的各项涉农资金与扶贫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经过 5—10 年努力，使我国乡村落后面貌整体改观，实现城乡和谐发展。

（作者蒋高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大学教授；原寒：中科院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责任编辑：张亮）

2019 年在四川农村的见闻

伍　国

我把这些所见所感记录下来，虽然这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和调研，只是纯粹的带有偶然性的个人观察和谈话，因为我的旅行和短暂停留的目的只是陪同母亲探亲，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也目睹和感悟了正在巨变中的中国乡村和三代亲戚的经历。

我探访的两处乡村位于成都平原，距离成都市 80-100 公里左右，交通十分便利。在一位表姐的家里，从表姐夫口中了解到，目前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舒适的。务农的表姐夫肯定了近十年来农村的积极变化，包括国家加大力度对种地和对农业机械行业的补贴，对孤寡老人，残障人士及照顾他们的晚辈，甚至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老人提供的各种补贴。国家目前收购粮食的价格甚至高于市场价格，他说。他认为，国家政策对农业和农村的倾斜是改善农民生活境况，使农民获得满足感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提到，这是国家针对过去对农民的亏欠做出的补偿。由于所有这些政策加上农民拥有的宅基地，他认为，现在城镇户口对农民已经没有太大吸引力，而且他们还骄傲于自己可以吃到和向亲友分送新鲜的有机食物。他承认，他家自己吃的和送给亲友的蔬菜是施用有机肥而不用化肥的。

同时，技术进步和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也使得农民的劳作强度比过去大为减轻。在我到访的那天，他家的土地已经约定了要雇佣无人机播撒化肥并准备让我观看，但后来因为下雨而取消了。他们夫妻（独生女儿已工作和出嫁）目前承包了一百亩土地种植水稻，同时还种植一些自食的蔬菜，但并不觉得困难。他说，过去农村的“晒谷场”也已经被烘烤设备取代。另外，由于外出务工收入大为提高，不自己种粮食的农民很容易用打工收入购买粮食。在其他亲戚中有的大规模养羊，养兔，有的养蜂酿蜜，有的种植柑桔等经济作物，有的开餐馆。经历了集体化时代晚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出打工生活，他们都感觉目前的生活是让人满意的，也有了闲暇和闲钱外出旅游。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表哥亲口对我说，过去无法想象今天还能在县城里买房。所有的农村亲戚家里都有轿车，较多的是合资生产的大众，现代，也有开奇瑞的。由于四川农村夏天较热，家家都安有空调。而这些亲戚也并不讳言自身的勤劳是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闲不下来”。

尽管我无从考证他们在闲谈中所说的关于政策的内容完全属实或者都落到实处，但是他们对生活的满足感却是可以明显感觉到而不能否认和回避的。当然，这种获得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几十年前的极度贫困

和匮乏，以及十几年前的艰辛劳作的记忆基础上。也就是说，由于比较所参照的基点本身很低，目前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让绝大多数的亲戚感到满意，但这种“纵向比较”带来的正面和积极感受，确实也是不容忽略的。

另外，他们的获得感和受教育程度以及与此相关的阅读及资讯获取也有关系。我在和国内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接触闲聊的过程中发现——接受资讯越少的人越容易对切身利益的满足和生活的便利持肯定态度，而阅读量越大，资讯越多元的人（有时和学历无关）越可能超越自身的直接利益而发展出更深层次的社会批评意识和独立的观点。比如，一位学历并不高但自称看书多的北京出租车司机认为中国文化从根子上就有问题，这些年的社会在本质上根本没有进步，中国人缺少创新，“共享经济”过犹不及等等。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总体上仍然处在脱贫的过渡时期，很多中老年人仍然生活在对过去的贫困和艰辛劳作的记忆里，大量长期压抑个体欲望和权利意识，“低度地活着”的村民是不难对确实有显著改善的现状感到满意的。中国人在“低度”地生存的同时，也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和灵活性。

乡镇仍然是一个血缘的社会和人情社会。一位后来定居县城的表哥不停地接到朋友邀约他喝酒的电话。他说，喝酒是维系人际关系的方式，如果不去赴宴，就会被别人认为是“不给面子”。几年前，这位表哥二十多岁的独生儿子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因为安全防护不到位从高楼上摔下身亡，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心理危机。他承认，如果没有家族里亲戚的支持，根本无法想象如何活下去。他在和我的对话中，还下意识地强调哪家有老人过世的时候，哪位亲戚“马上就来了”，而他则积极帮助其他亲戚在县城买房，装修。

从这里可以看出，亲戚之间的交往和慰籍仍然是维系一个个体生活意义的重要精神资源。另外，这位表哥认为，在每一代亲戚圈里，都需要有一位特别有威望的人来调解纠纷，摆平争端，但这样的角色慢慢在消失。多子女的老人，也就是我的姑妈姨妈叔父一代人对生活的满足感也很高，而且特别满意于在不同的子女家自由来往，接受赡养和照顾：“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

当然，对一些已经彻底“走出乡土”的亲戚来说，这样紧密的亲戚关系未必就是他们期待的。一位已经在外省的省会城市定居的 70 后表妹就多年不回乡，因为亲戚之间的“红包”文化和她所承担的给长辈和晚辈“发红包”的义务让已经离开多年的她产生了抵触甚至厌烦。当我和我母亲两年前去她所在的城市探访她的时候，发现她是在自己在当地的微信朋友群，而不是亲戚群里分享关于我们访问的消息和照片。这样看来，在她目前已经城市化的生活中，故乡的亲戚和家族网络的重要性似乎已经让位于身边的可以随时给她提供各种信息和帮助的，有更多现实交集的“朋友”们。上个世纪的打工潮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村青年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社会而且不再回头（亲戚中也有打过几年工然后回乡结婚的），但也成为他们（部分）摆脱旧有乡土“亲戚圈”，在异乡建立“朋友圈”的契机。另外，她虽然受过的正规教育不多，但经常在城市的书店和书摊买书来看，对不少时事问题都能表达自己的观点。

以我短暂的观察来看，乡村的凋敝至少在我所看见的地方并不存在，亲戚们的心态总体确实非常积极向上。这得益于这一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主观上也建立在对过去的艰苦的记忆基础上的相对获得感，同时和中国农民“闲不下来”，一有机会“总要找点事做”的勤俭传统和乐天知命，负有家庭责任感的文化心态有极大关系。同时，政策的改善落实和技术进步也对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心态的放松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我看来，这一带乡村的主要问题似乎既不是经济和环境的凋敝，也不是亲情和传统道德的缺位，而是知识和认知意义上的空白和精神上的某种空虚。由于过去的贫困，如今在五十岁上下的亲戚大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有的初一就辍学，有的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辍学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家庭贫困，兄弟姐妹众多，有的则是因为实在“学不进去”——当然，“学不进去”和家庭经济状况以及上个世纪农村总体文化教育氛围的欠缺，教育质量不高也存在关联。一位表兄在回忆这段失学经历的时候，显得很遗憾和难过。从这个意义上看，不是乡村不需要文字和文化，而是贫穷限制了文化教育的获取。

这种情形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在目前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的亲戚中，在劳作和挣钱之余没有更充实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不读书报，不看影视剧，不上网，闲下来的时间就花在聚餐，抽烟，喝酒，打牌上。尽管这些活动也有效地维系了传统的亲情和朋友网络，但当面对我这个外来的亲戚的时候，有时双方在短暂寒暄后会陷入失语和无法交流的状态。他们会好奇地问：“你不抽烟，不喝（白）酒，不打牌，那你平时干什么呢？”我无言以对。或者他们会略微无奈地表示“（我们也想好好招待你，但）你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他们对美国也有了解的兴趣，或许是为了维系聊天而谈起美国，但这方面的知识显然极为欠缺。他们会在吃饭的时候问我：“美国有没有大米？”在开车的时候会问：“美国的高速公路有中国好吗？”或者泛泛地问起“美国人也像我们这样……吗？”

我常常觉得，他们心目中的“美国”似乎不是一个和中国同在一个星球上的，同样由人类构成的社会和国家，而是一个极其遥远和神秘的，外星文明一般的存在。他们更不可能知道，美国早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就建成了全国性的州际高速公路网络，而高速公路道路出口的密度远高于中国。从“高速公路”的问题看，他们面对美国时产生的并不是批判，仅是一种因为缺乏相关的知识和资讯，又被中国的高速发展刺激起来的盲目虚骄。

有的人在网上说，普通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远远超过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如果我们的观察仅仅局限在大中城市的有较多资讯和国际知识的中国人，或许这个说法是对的（事实上，大中城市的居民对美国也存在种种误解，其中一个就是普遍认为美国人一到 18 岁就被父母毫不留情踢出家门去“独立”），而在农村和乡镇一级，中国民众对美国的了解可以像我上面所经历的这样，几乎仍然处于蒙昧的状态，而这还是在距离成都只有一个小时车程，几乎家家有车，人人用微信的地方。

尽管这仅仅是一次探亲之旅而非任何意义上的调研，当我真正进入乡村之后，所关注的重点不是外部可见的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凋敝，因为这一点我确实没有感受到，而是需要一些交流才能感受到的知识上的严重贫乏和认识缺陷。或许，当我们在讨论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的时候，也不妨稍微离开大都市知识精英的文字论述，而关注一下在村镇的亲戚熟人社会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如何看待美国和任何中国以外的国家和社会，并和普通美国人的中国观相对照。这也不妨是思想史研究视野下移的一种当代实践。在我看来，乡村所需要的是教育水平的持续提高和信息以及现代知识的加大普及。村民不可能永远沉溺在物质和口腹之欲的满足和“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好多了”的“忆苦思甜”心态中。

在目前五十岁上下的，完整经历了从集体化时代到市场经济，并脱贫和实现小康的一代人的孩子，也就是我的侄辈里又出现了一种分化。他们中一部分已经城镇化的高中学生由于父母一代为他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已经不再有经济上的压力而能专注于学习和业余爱好，假如再更加积极主动地阅读课外书籍，就可以完全摆脱父辈的精神蒙昧状态。他们和我讨论的是村上春树、特朗普、美剧、《流浪地球》，课外阅读的可以是《艺术哲学》，课余学习钢琴，年龄稍大已经大学毕业，在城市从事白领专业技术工作，通常没有什么恶习。当然，这仍然不是所谓的，只能作为特例的“寒门贵子”现象，而恰恰是作为常态的，建立在父母相应的经济实力基础上的追求和趣味。

另一部分过去因学习不好而辍学跟随父母去大城市打工，现在又（或者离开父母或者跟随父母）回流乡土，定居县城的 90 后侄辈，虽然不一定像父辈那样终日抽烟喝酒打牌，但又陷入到新的不良习气中，比如网瘾，啃老和过度消费。父母在县城为他们买房买车带孩子，他们则在从事一些简单工作之余靠狂刷信用卡负债过活。这部分人在知识层面上可能还是和父辈一样处于蒙昧和半蒙昧状态，但在生存奋斗的意义上又失去了父辈吃苦耐劳的精神，成为刚刚摆脱贫困进入小康的父母和祖父母荫蔽下的“二世祖”。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对儿女的过度呵护，父母因为自己过去的艰苦对儿女产生的愧疚和补偿心理，以及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就这么一个孩子”心态都造成了对返乡 90 后的某种纵容。

事实上，在我观察到的三代亲戚中，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奠定了某种基础，而后两代都有各自的突破。第一代人通常终身务农，第二代（即我这一代）大多有走出乡土，进城打工的经历，后来有的陆续或计划回乡，少数定居城市，而第三代中开始出现大学毕业生。学业表现，阅读体验，对知识和信息的兴趣与接触，和是否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仍然在一个人的世界观、知识结构、兴趣品味、关注点的形塑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一般老生常谈的“教育改变命运”，更是一代人的格局和精神世界实现重构的途径。

（作者：美国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学院（Allegheny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中国研究专业负责人，主要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人类学史及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政治和学术话语构建过程）

温铁军：踏遍乡村心未老

郑心仪

人物简介：1951 年生于北京，著名“三农”问题专家。1968 年插队，1979 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在多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从事政策研究，2004 年开始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证书、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 年“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等。

冷眼热肠，这是余英时评价钱锺书的词。如果把这个词送给温铁军，他多半会收下“冷眼”，还回“热肠”。“作为一名研究者，我必须客观，不能强调感情因素，否则我的研究就不是理论，而是文学。”面对《环球人物》记者，温铁军答得肯定，他用“冷眼”观察中国农村 70 年发展及其制约因素，用数字、论据来检验理论，把“三农”问题的内在逻辑条分缕析。

有一个细节流传得很广。2003 年，在“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颁奖嘉宾吴敬琏说：“中国的农民很不容易。我常常觉得，9 亿农民就像希腊神庙里的柱子，他们托起了大厦。农民很多，但是真正关注农民的人不是很多，替农民说话的人也不是很多。而温铁军就是农民的代言人。”站在一旁的获奖者温铁军显得有些腼腆：“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研究而已。”

温铁军的这“一点调查”，从上世纪 80 年代做到了当下，先后调研了 40 多个国家的乡土社会。他说，“认认真真地用自己的脚走了一趟，用自己的嘴去问了一趟，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一趟”，是自在之人“走向自由王国”而为自觉人的必由之路。

“最野”的两次出游

温铁军左右两个膝盖上都有劳损，走路超过半个小时就走不动了。好在他年轻时“脚比较野”，走过很多人一辈子都走不完的路，如今回首往事，最难忘的还是走得“最野”的两次。

第一次是 1985 年，温铁军 34 岁，从青藏高原出发，沿着黄河，由黄土高原下到华北大平原，再到山东入海口，4 个月跑了 8 个省。“当然不是用脚跑，而是骑着摩托车跑。我把能住的地方都住过了，老农家、废窑洞，在空教室里拼桌子就算是好条件。我永远记得那天高云淡，也永远记得那一片蛮荒。”那一趟，温铁军体味了“人被大自然压抑得仿佛只剩下一颗渺小沙粒的感觉”，也让他“对农村的复杂性有所认知”。

第二次是 1991 年，苏联解体，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的温铁军不相信美国人“Next must be China（下一个是中国）”的论断，自费前去摸索苏东解体的教训。他去了东德、克罗地亚等 7 个东欧国家，历时 40 天，花了不到 2000 美元。“那里中国人很少。我就找了个当地的小咖啡馆，买一杯咖啡，然后转身对盯着

我看的人群问：‘谁懂英文，我跟你们聊聊？’肯定就会有人搭话。我与战争难民同居过一室，也穿行过全是沙袋、军人的街道，亲眼看到了激进变革给老百姓带来的影响。这让我知道什么是社会成本、转型代价，那是老百姓的苦难。”回国后，温铁军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记录了他的观察与思考，题目叫《苏东七国私有化经验教训的分析》。

两次经历之间，相隔的不只是 6 年，还有从实践认知到理论思考的跨越。而跨越的关键点，是温铁军迈进了一道门——从黄河边“野”回来不久，他被分配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室主任就是杜润生。这个后来以“九号院”之名而名垂改革史的部门，从 1982 年到 1986 年，连续 5 年酝酿形成了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建立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

温铁军被安排到了联络室，负责联络各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动员他们下乡调研。除此以外，他开始学习农村知识。“我当时其实都不懂，就请理论比较好的人给我列书单，然后没日没夜地看，饿了就上街吃碗面条，晚上就睡在办公室里。还有就是跟老同志出去做调查，听他们讲自己的经历和见解。”

“用脚做学问”的基础就是在这时打下的。“我们买张车票就出发，到了乡里借辆自行车蹬着就上村里了，蹲点的时候一住十几天。我们回来报告时，杜老先问我们入了几个村、住了几个户，达到要求了，再往下听。”

在中央一号文件停发的 1987 年，温铁军被派往美国学习研究方法，回国之后调入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更是将实地观察、试验研究当成了习惯。1988 年，他发表了《危机论》《民间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地方政府行为》等接地气的学术文章。

“经过十几年本土试验区的实证和国际比较研究后，我发现书本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改用辛弃疾的一句词来说明：‘近来始觉洋人书，信着更无是处。’”

1998 年，温铁军离开了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1999 年，他发表了《百年中国一波四折》和《“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尽管他说自己只是个“农村试验员”，但学者温铁军逐渐被大众熟知。

“基层的生活教育让我懂得了农民”

2013 年，温铁军出版了著作《八次危机》，一年之内加印了 6 次。这本书是他的“三十年磨一剑”，他说：“从 1979 年捧读‘社会主义结构性危机’（手抄本）、1988 年发表《危机论》开始，我就是在为这本书做准备。”而源起则是 1998 年有人请“闲下来”的温铁军牵头做 20 世纪中国史经济卷的研究与写作。

《八次危机》描述了 1949 年至 2009 年中国发生过的 8 次周期性经济危机。“指出中国经济史上周期性经济危机并不是我的创新，因为马克思早就说过了。我的理论创新是指出，危机能不能‘软着陆’取决于危机的代价能不能从城市产业资本向‘三农’转嫁。成功地把危机代价转嫁到‘三农’的，就是‘软着陆’；不能转嫁，砸在城里的，就叫‘硬着陆’。而‘硬着陆’导致的结果，要么叫调整，要么叫改革。”在这本书中，对应的例子既有上世纪 60—70 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自 1979 年开启的大规模经济改革。

有人说他的理论是颠覆性的，但在温铁军心里，书中的每一个字句都植根于他所亲历或见证过的现实。

温铁军是“非典型”的大院子弟。他从小生活的大院，不是军队或者机关大院，而是学校大院——他的父母是中国人民大学 1950 年建校时的第一批教授。“我小时候完全不了解社情民情，别说农村了，连北京老百姓怎么过日子都不知道。”等他上了初中，由学校组织去京郊劳动，帮农民拔麦子，才算第一次“脚踏实地”。

他真正深入农村是在“文革”开始后，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5 岁的温铁军背着背包去“长征”，先是跑到了河北遵化县大老峪帮农民挑水抗旱，接着被安排去了山西汾阳插队，从此在工农兵的基层岗位上工作了 11 年，一直到了 1978 年才以工人身份“对调”回京。次年，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温铁军，实践了毛泽东说的“滚出了一身泥巴”。他压根儿没用“伤痛”“耽误”这样的词来评价知青岁月，而是感慨“基层的生活教育让我懂得了农民”。

“刚开始进入他们的环境，我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只是疑惑农民怎么一天到晚都骂骂咧咧？后来我跟着大队干部赶着大车往公社送粮，听他们聊，才理解了情绪何在。那时候农民往城里送的都是好粮食，那些瘪的坏的，就自己留着吃。如果遇到年成好，小麦丰收了，农民多分两斤麦子也不行，超收的部分得交给国家。他们付出那么多，得到的却那么少，所以才有怨气。”

很多年后，温铁军在自己的研究中，补上了这段岁月的历史底色：“《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里写道，国家要搞工业化，就得积累资本，这就得让一部分人作出牺牲，中央反复讨论，只好让农民作贡献。至于集体化向国家工业化贡献了多少，一直以来都有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的闫瑞珍教授研究认为，城市产业通过剪刀差提取的‘三农’剩余大约是 8000 亿元人民币。那时全部工业固定资产还不足 1 万亿元。”

温铁军的视野还看向了国外。他跑了 40 多个国家，到处去做农村地区的调查研究，看过印度的游击区、巴西的贫民窟，深入过墨西哥的“蒙面军”，发现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而“中国村社制度下农民承受劳动力转移风险的能力大大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才是中国高增长真正的比较优势”。

“从 1999 年中国主要决策者提出以人为本，到 2007 年提出生态文明，再到今天强调乡村振兴，都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传承复兴的整体努力，《八次危机》是我们团队顺应这个变化过程所形成的研究与思考。”复兴生态文明，维持乡土社会内部化来应对外部性风险的综合性合作与自治，是温铁军在书中给出的中国免于周期性危机的求解方式。学术化的表述让答案显得冷硬而晦涩，但折射到行动上，却有温度得多，也早得多。

翟城村的“诺亚方舟”

有 3 年 10 个月的时间，温铁军几乎活在媒体的聚光灯下。那是从 2003 年开始的，他的团队有几个年轻人跑到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办了新世纪第一所免费培训农民的学校，名字叫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1926 年，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就是在这里推广平民教育运动的。

无论是“劳动者免费就学”的口号，还是温铁军的名人效应，都让学院备受媒体关注。温铁军几乎在田间地头的每个角落都接受过采访。他的名字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绑定起来，有媒体称：“晏阳初归来！”但最开始，温铁军并没有这么情愿：“我其实是被年轻人拖下水的。”学院工作人员潘家恩闻言大笑：“确实如此。”

2003 年春节，温铁军任社长的《中国改革》杂志的编辑邱建生带着一群下乡支农调研的大学生来到翟城村过年。时任翟城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一直希望能利用晏阳初这一历史渊源，重振村庄声名。米金水去见了邱建生。不到半年，学院成立，温铁军被大家推举为学院的第一任理事长和院长。邱建生跑去找了温铁军 3 次，温铁军才有条件地同意了。

“我是觉得年轻人浮躁，以为想干事就一定能成。就算是当年的阳初先生，在这里干成事了吗？所以得给他们泼泼冷水。如果真干了，我可以挂个名尽量争取到公共资源，但事情得由他们自己来做。他们该怎么受挫折就怎么受挫折，该怎么难过就怎么难过，我不管。”温铁军说得不留情面，最后还是忍不住补充道，“不过关键时刻的临门一脚，我是得踢的。”

2004 年 4 月，在翟城村驻村的邱建生、袁小仙、潘家恩收到了一封题为“ORDER（命令）”的邮件，要求他们立即开课。邮件来自温铁军，他来踢这临门一脚了。

“我们的院址是村子里一座废弃的学校，由村委会花 39 万元买下的。温老师自掏腰包捐了 6 万元，还到美国演讲筹了 5000 美元。但办学条件还是艰苦，没有暖气，窗户连玻璃都没有。整个学校的常住人员就我们几个，也一直没开课。温老师让我们开课，我们就说没有教材、没有讲师，总之是条件不成熟。结果他发来邮件，意思是一定要办。我们当时都不理解，后来才知道，因为时隔 18 年，中央又发布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紧扣中央政策。温老师的政策敏锐性非常强。”潘家恩告诉记者，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第一课，就是温铁军向农民解读中央一号文件。

此后 3 年，温铁军频繁前往学院，实验循环经济和生态建筑，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但媒体的高关注度也让学院的每一步都引来议论：带农民做早操、学唱歌、玩游戏，教学方式匪夷所思；用辣椒大蒜浸汁等“土办法”杀虫、建造“地球一号”生态建筑、请台湾建筑师教农民使用粪尿分离的生态厕所，教学内容备受争议。

2007 年初，温铁军接受央视《面对面》节目的采访，主持人的问话非常直接：

“我看到你们课程的安排，绝大部分跟生产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那这个学校的未来你乐观吗？”

“但是按照这个现实来说，即便你这个试验成功了，不还是空中楼阁吗？”

……

温铁军并不生气。“我没乐观过。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困难重重，到现在为止它的情况也不算好。尽管已经培训了很多批农民了，各地农民也确实接受了一些东西，开始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但我想改良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他面对主持人微笑，有一种清醒的镇定。

《面对面》采访结束后的那年 4 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停办。学院工作团队选择了离开。“我们是 2007 年 5 月 15 日到的北京，温老师的生日刚好是 5 月 16 日，于是就去给他过生日。我们或多或少有些茫然和沮丧，温老师却笑眯眯地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人，只要你们在，哪里都可以做乡村建设。这次挫折也是对我们的考验。任何事业都会有波折，无数次终止，无数次重启，遇到困难反而可以考验我们能不能继续坚持。’”潘家恩回忆道。

“种子撒下去了”

“游方僧”是温铁军的微信名，意思是“云游四方的僧人”。其实按照他原来的想法，60 不做、70 不述、80 不说——“60 岁体力差了，事情交给年轻人做；70 岁调查研究能力差了，就不写东西了；80 岁思想更新能力不行了，就不要瞎说些老话干扰别人了”。但如今 68 岁了，他仍在路上。

有时是去福建。温铁军 2013 年在福建农林大学创办了“海峡乡村建设学院”；2017 年兼任了“新农村发展研究院”的执行院长。去年北京大学成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温铁军又被聘为乡村振兴中心主任。

邱建生也在福建，这里是他的老家。他先是在福建福前镇办起了农村文化中心，不久又在培田村创办了福建省第一家“社区大学”，近年来还创办了“永春县生态文明研究院”“永泰县乡村振兴研究院”。他在网上以“乡村之光”为名，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发现乡村，保护乡土文明。

有时是去重庆。2012 年，温铁军以执行院长的身份在西南大学恢复了晏阳初 1940 年成立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他还把西南大学发的全部工资捐给了学院。

从翟城村回北京后不久，潘家恩去了香港读博士，开始研究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历史。2011 年底，他带着在乡建中相恋的妻子杜洁来到了重庆北碚。他们被当地厚重的乡建历史所震撼，于是潘家恩留在了重庆大学做老师，杜洁放弃了香港的在读博士成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第一名员工。这些年，潘家恩以高校为新的乡建空间，和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的同仁们一道，让“乡建学术化、学术乡建化”，把乡村建设变成可以让更多人讨论和思考的经验。2018 年 11 月，温铁军受邀出席了潘家恩在重庆组织的“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展”。

有时是回北京。温铁军在这里指导研究生，推进多个与乡村建设相关的单位，同时还兼任着几个大型涉农企业的独董。

这里有他的博士生石嫣、程存旺。2008 年，“进城”后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工作团队，和他们一起，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社区支持农业（CSA）农场“小毛驴市民农园”。从那时起，石嫣已经当了近 10 年的农民。2011 年，她与程存旺在农场举行了婚礼。如今，全国 CSA 农场超过了 500 家，石嫣又开始了最新的项目“屋顶菜园”。2016 年，石嫣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选为“世界青年领袖”，2018 年又当选了世界 CSA 联盟主席。

“我们常说，对温老师要‘保护性开发、学习性继承’。因为现在乡建的摊子铺得太大了，每个地方都需要他。很多时候我们于心不忍，他都是快 70 岁的人了。所以大家就约定，以后除非是非他不可的情况，尽量不要打扰他，以便他能有更多时间写他一直想写的书。但事实上做不到，他依旧是我们的思想发动机。”潘家恩感慨道，曾经以为是天女散花，其实已遍地结果。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杜润生曾对温铁军说：你们这个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要是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志愿者下乡，我们的事业就成了。在采访的最后，温铁军想了想说：“早几年种子撒下去了，或许还会有些放不下，现在投身乡建事业者何止成千上万，我可以死而无憾了。”

（作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责任编辑：张志国；刊于该杂志 2019 年 3 月 1 日总第 392 期）

关于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探讨

——解答对粮食进口增多的疑虑

朱丕荣

最近，有位朋友向我提问：近年来我国进口的粮豆等农产品很多，而且现在肉、奶、水果等也在扩大进口；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也不断增加，为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农业前景有所担心。

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从国际经济合作综合考虑，全面分析。我认为，农产品进口多，不完全是坏事，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农业对外开放的趋势，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进行合理调整的举措。是有利有弊，利大于弊。

一、粮食安全的国际概念：粮食是指食物，不仅是谷物。粮食安全，首先要产量充足，能满足社会需求。二是要能买得起和买得到粮食。现在全球有 8 亿多人饥饿与营养不良，（就包括有买不起的人）全世界 9 个人中有 1 人。日本是发达国家，地少人多，购买进口粮，但口粮大米要想法自给的。三是要有储备粮，据粮农组织测算，要占需要量的 17-18%，保证与新粮衔接。四是要求有营养、保健，即高质量、绿色、不污染的食物。

二、党中央十分重视粮食安全。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只有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不能轻言粮食过关了”。各级领导和农业部门一贯认真贯彻执行这些重要指示，并取得成效。

三、70 年来，我国粮食产量是不断增长的。1949 年粮食总产量是 1.13 亿吨，1952 年 1.63 亿吨，近年来连续在 6 亿吨以上，2018 年达 6.57 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978 年为 319 公斤，2017 年达 450 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00 公斤）（1949 年人口 5.4 亿多人，2018 年近 14 亿人）。1959 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粮食困难，实行定量供应。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状况逐步好转，城乡市场食品供应充足，品种繁多，质量提高（食品质量安全合格率 97%以上），物价稳定，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据统计资料：人均消费是（1978 年到 2017 年）猪肉从 13.7 公斤增加到 20.6 公斤，禽肉从 1 公斤增加到 9.7 公斤，鲜蛋从 3.7 公斤增加到 10.3 公斤，水产品从 10 公斤增加到 20.3 公斤，奶品从 3 公斤增加到 36.9 公斤。

四、从国际农产品贸易看，过去我们过紧日子，出口农产品换取工业品。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很快，总额达 279.1 亿美元，比 1978 年增长 3 倍多，2010 年达 1207.9 亿美元，2004 年开始成为农产品贸易逆差国。2018 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为 2108.1 亿美元，其中进口 1371 亿美元，出口

797 亿美元，逆差 593.9 亿美元，成为全球农产品贸易第二大国，农产品进口第一大国，出国第五大国，现在处于“买全球，卖全球”格局。近年每年仅谷物进口二千多万吨，大豆八、九千万吨，还有油、糖、棉等其他产品。进口增多的主要原因：一是需求增长。为发展畜牧业、饲料工业大发展。1980 年全国饲料工业产量只 110 万吨，1990 年达 3194 万吨，2010 年 1.62 亿吨，居世界第一，2016 年超过 2 亿吨，需粮豆作为原料。二是国际市场货源充足，价格比国内便宜，如大豆国产的每吨需 4100-4200 元（人民币），进口的每吨只 3100—3200 元（人民币），多进口，可储备用。据专家分析估算，近几年过度进口粮豆达五、六千万吨，目前粮食自给率 82—86%，主粮自给率 95%。当前我国是货物出口大国，工业品出口较多，创汇多，为了照顾一些国家（如东欧、非洲、拉美、东南亚）贸易平衡，适当进口肉、奶、水果等农产品，我国消费市场广阔、潜力大。现在我国进口的农产品属土地资源型产品（谷物、豆类、油料、棉、糖等），出口的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水果、蔬菜、水产品等），这样有利于缓解我国水土资源的压力。中国人均耕地只 0.8 公顷，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 1/3。据专家估算，现在我国进口的农产品相当于 7 亿到 10 亿亩耕地的产能。（中国自有 18 亿亩耕地）。

大豆进口多，影响我国农民对大豆生产积极性，国家采取措施，扩大大豆种植面积，提高大豆的收购价格，给于补贴的政策，促进大豆增产。

五、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重视农业走出去的新的战略措施，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开展多种形式合作，在境外建立多种农产品基地，促进互利双赢、共同发展。

2016 年统计，境外农业领域投资仅是 148.5 亿美元，扩展到 90 多个国家。如中粮集团公司已收购全球二大粮商（荷兰基尼德拉集团和新加坡来宝公司），其资产与机构覆盖 60 个国家和地区，业务涉及 140 多个国家与地区，海外经营收入占一半以上，经营量达 1 亿吨，预计到 2020 年海外营业收入将占 60%以上，海外粮源掌握量超过 5000 万吨，第三国贸易量超过 8000 万吨，总经营量达 2 亿吨，成为国家粮食进出口战略的国家队。还有一些骨干企业，中国农业发展公司，农垦集团，水产总公司等在境外建立开发区、基地。农垦部门在 40 多个国家与地区建有 106 个合作项目，境外产值达 460 亿元人民币。集体与民营企业在境外农业合作更多，如伊利、蒙牛奶业、光明食品、双汇食品，上海鹏欣集团，四川新希望等集团都在发展壮大。光明集团在海外营业收入 226 亿元人民币，总资产达 329 亿元人民币。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得到沿线国家热烈响应，与 23 个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加强农业科技经贸合作，2016 年底统计，农业投资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项目达 185 个，合计 156 亿元人民币，2017 年与 58 个国家签署 126 个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大农业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更大空间，有利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巩固粮食安全，同时推进各国农业共同进步，繁荣发展，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实施。

（作者：原农业部国际合作司长；2019 年 8 月）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与重大贡献

刘明国

到2020年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华民族历史上将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一项惠及亿万人民、举世无双、史无前例的伟业，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绕不过去的坎。要打赢打好这场战役，就必须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我国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领导和发动的一场伟大斗争；指导这场斗争有力推进的重要行动指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当前，脱贫攻坚到了最紧要关头。4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强调：“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的关键阶段，务必一鼓作气、顽强作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夺取这场斗争的全面胜利，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正确指引，需要我们视野更高一步，认识更深一层，从实践、理论、政治三重意义上深化对重要论述的理解，牢牢把握其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学深悟透做实。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实践意义重大，是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理论最根本的生命在于实践，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从梁家河到正定和宁德，从基层到省市再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扶贫工作的实践与思考，经过了近半个世纪，花的精力最多。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亲自部署、自督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对各级各地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扶贫论述，需要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七个坚持”基本要求。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强化组织保证。强调脱贫攻坚必须坚持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发挥县级党委作为全县脱贫攻坚总指挥部的关键作用，加强村级组织建设。二是坚持精准方略，提高脱贫实效。强调各级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第一书记）、脱贫成效等“六个精准”，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弹炸跳蚤，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

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并就“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三是坚持加大投入，强化资金支持。强调要发挥政府投入主体和主导作用，增加金融资金对脱贫攻坚的投放，发挥资本市场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作用，吸引社会资金广泛参与脱贫攻坚，形成脱贫攻坚资金多渠道、多样化投入。并对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对口扶贫的东部地区增加扶贫资金投入和加强资金监管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四是坚持社会动员，凝聚各方力量。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两方面力量作用，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各方面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并对区域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定点扶贫的政治责任提出明确要求。五是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强调必须坚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工作全过程和各环节，实施经常性的督查巡查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确保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使脱贫攻坚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六是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强调脱贫攻坚必须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的关系，培育贫困群众自力更生意识，提高他们发展生产和务工经商的技能，组织、引导、支持他们实现勤劳致富。七是坚持弱鸟先飞，做实地方经济。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以审视的眼光看待不适应我们获得更快发展的一切并对其进行改革，同时要防止急功近利的“显绩”。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脱贫攻坚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脱贫攻坚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七个坚持”的基本要求多数见诸《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一书，也有部分论述源自于《摆脱贫困》。通过对照学习，让人深刻地感受到，《摆脱贫困》一书中蕴含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脉相承，有着一以贯之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与实践密切联系着的真知灼见。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思想深邃、理论意义重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和世界减贫道路的巨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具有鲜明的马克理论特质，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成功实践，也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这些重要论述的科学性、真理性，更加凸显了其理论价值。

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40 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农村到县、市、省、中央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在不同阶段开展扶贫工作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破除致贫根源精准谋划、为满足脱贫需求精准帮扶。强调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以战略思维谋全局，以系统思维聚合力，从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出发，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推动形成扶贫

开发大格局。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贯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现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解决了我国脱贫攻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极大地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这些都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已经成为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马克义反贫困理论重点在于解决存在剥削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工人阶级面临的贫困问题，其中关于无产阶级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对我们开展脱贫工作、实现稳定致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一脉相承，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农村贫困问题以及治理贫困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探索，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消除贫困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些重要论述所阐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探索和贡献了全球减贫和落后地区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以来的接续奋斗，让 7 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八大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打响精准脱贫攻坚战，连续 6 年平均每年减贫 1300 多万人，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贫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脱贫攻坚的显著成就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中国的脱贫攻坚和经济发展，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为这些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参考，可以帮助各国打破发展瓶颈，缩小展差距，共享发展成果，打造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发展共同体。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扶贫重要论述还用相当篇幅对于建设一个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世界，作了深刻阐述，并就积极开展南南合作，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主张，采取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对于全球减贫事业的责任担当，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政治意义重大，是对党保持初心和巩固执政基础的又一战略擘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高度和远见看待脱贫攻坚，从中国国情和长远发展大局出发谋划脱贫攻坚。

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发展为了人民，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天下劳苦人民谋幸福

的目标，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希望全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国还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众，真正要帮助的还是低收入群众，全党会要继续关心和帮助贫困人口和有困难的群众。这些论述，都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和观点。

彰显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指引下，脱贫攻坚工作强力推进。在政策出台上，从2015年11月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到制定10个配套文件，再到32个牵头部门和77个参与部门出台的118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及各地出台的一系列实施方案，构成了全面推进脱贫攻坚的“1＋N”精准脱贫系列文件。在资金投入上，2013年以来，中央、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年增长20%以上，且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全面推开，有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在强化落实上，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实行“五级书记抓扶贫”，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责任制；加大各方帮扶力度，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加大督察考核和扶贫领域问题专项治理力度，有效推动脱贫攻坚责任落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有力巩固了党在广大农村地区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2012年至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8239万人，年均减贫1373万人，贫率累计降低8.5个百分点。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71元，实际增长8.3%，实际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增速1.7个百分点。从百色起义策源地和党在全国民族地区建立第一个红色政权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国家级贫困县田东县的情况看，不仅2016年以来全县贫困人口收入现了翻番增长，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民生保障极大改善，而且更宝贵的是有三个“金不换”的可喜变化。一是贫困群众精气神变足了。由于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多措并举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切实把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自主脱贫的决心和信心激发了出来，实现了“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转变。二是党群干群关系变密切了。广大帮扶干部积极进村入户扶贫，风里来雨里去，“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热情，绘就扶贫工作的动人画面，用初心换民心、赢民心，在广大群众心目中树立了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在农民特别是贫困群众心中，党的地位更加稳固，党员身份认同也得到加强。三是农村社会风气变好了。脱贫攻坚中，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极大地加强，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困难群众收入大幅增加，生活大大丰富，期待和诉求能够得到及时回应，群众的获得幸福感、安全感大幅提高。“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正是因为这些变化，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作者：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常委、田东县委书记）

创新驱动 智慧兴农 全力开创数字农业发展新局面

周士良

江苏省无锡市依托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的先发优势和区位优势，以全国首批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建设为抓手，加大政策资金支持力度，促进农业与互联网产业深度融合，强化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等新技术应用，培育农业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有力助推全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一、注重生产高效率，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成效显著

从2014年起设立了市级农业信息化专项资金，累计投入资金达到1730万元，全市累计建成规模农业物联网应用点284个，覆盖大田种植2万亩、水产养殖1.8万亩、设施园艺0.77万亩、畜禽养殖16万平方米，切实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推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精细化自动化智能化方向迈进。宜兴市成为江苏省智能农业示范县，锡山台创园成为省级智能农业示范园区。全市涌现出江阴华西都市农业园、锡山欧姆龙智能产业园、宜兴同人生物等一批物联网技术应用先进典型，培育出百盛传感网络、汉和航空、富华科技等一批农业物联网技术设备研发优秀企业，形成了宜兴丁蜀农业物联网小镇、新区鸿山物联网小镇等一批农业物联网示范集群。2018世界物联网博览会期间首次成功举办智慧农业应用与产业升级高峰论坛，全面展示了无锡农业物联网产业的丰硕成果。

二、注重销售多渠道，农产品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充分发挥水蜜桃、葡萄等本地名特优农产品资源优势，农业、邮政等部门和快递行业通力合作，大力发展多种模式的农产品电子商务。宜兴市成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朝阳集团创新应用区块链技术推出了农产品配送APP“朝阳到家”，成为国家商务部等8部委认定的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成功创建全省“一村一品一店”示范村21家。全市农产品电子商务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趋势，2018年在线交易方式实现销售额达11亿元，同比增长37.9%。

三、聚焦服务广覆盖，农业信息服务平台持续完善

大力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设，全面实现了益农信息社的全覆盖。全市农业信息化覆盖率达到63%，成功建成全市农业地理信息系统，实现了全市农业产业面积、产量数据和生产对象的可视化智能化管理。新建成宜兴市信息进村入户益农信息社运营管理系统，进一步增强中心站与下辖益农信息社及信息员的联系紧密度。

2019 年，无锡市将认真落实中央、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中央、省的最新决策部署，加快实施数字乡村战略，为全市农业高质量发展培植新动能、打造新引擎。

四、在提高生产效率上下功夫，加快应用数字农业新技术

以“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建设为契机，集中力量实施一批农业物联网示范项目，加快推进区块链、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等新技术和智能农机、农业专用传感器等新装备在农业资源环境监测与控制、动植物生长识别、农业投入品使用、农机装备管理、重大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配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领域的应用，通过对传统农业的数字化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破解农产品同质竞争和增产不增收的难题。

五、在优化产销衔接上做文章，加快发展农业电商新模式

加快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利用互联网建立以消费需求为导向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突破“最后一公里”问题，真正实现产销对接，带动流通市场化，倒逼种养标准化，促进生产规模化，提升农民组织化，引领产品品牌化，实现区域特色农产品优质优价。加快出台政策鼓励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发展基于电子商务的农业产业模式。发挥互联网连接人、连接商业、连接产业的作用，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加速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让农民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的收益。

六、在促进城乡融合上谋思路，加快推动基础建设新成效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邢 NB—IoT 窄带物联网覆盖，推动 NB-IoT 网络在农业生产、管理等领域的商用，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向农村地区集聚，优化配置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资源要素，打通“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通道，使独具特色的乡村地域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有效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实现融合发展。

七、在完善管理服务上出实招，加快构建信息管理新体系

紧紧围绕农业农村管理服务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大力推进“一平台”（农业农村综合信息管理平台）、“四系统”（“互联网＋”农业生产管理系统、“互联网＋”农业农村服务管理系统、“互联网＋”政务管理系统、无锡市农业农村地理信息系统）、“一中心”（农业农村数据资源中心）建设，推进全市农业农村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逐步实现“资源保护可视化、农业生产智能化、行业监管精准化、产品经营网络化、农业服务多元化、决策支持数字化、行政办公自动化、农村生活智慧化”等八化合一功能。

（作者：江苏省无锡市农业农村局长）

如何加强农民技术培训 深化农业技术推广

李民芳　蒙江平

如何解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使得农业生产向着现代化、科技化的方向发展，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旨在培育出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从根本上推动我国农业产业技术的发展，提高农业经济生产总值，深化农业技术推广。然而，由于我国农民的平均素质偏低，对其展开技术培训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研究技术培训新形式、新模式。以下就通过陕西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澄城县分校开展的职业农民培育对加强农民技术培训、深化农业技术推广对加强农民技术培训、深化农业技术推广展开分析。

一、澄城县农民技术培训现状

近年来，澄城县农民技术培训工作紧紧围绕农村乡村振兴主题，立足实际，创新思路，丰富载体，注重实效，精心打造“粮——畜——果”的农业发展路径，全县呈现出了以粮食、苹果、生猪为主导产业，设施果蔬、樱桃、金银花等特色产业为主的农业发展局面，将农业的生产向着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向不断推进，为澄城产业结构调整，农业转型升级，推动脱贫攻坚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虽然农业产业发展较快，但落后的农业技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县域产业的转型和发展，以下就对澄城县农民技术培训现状展开分析。

（一）农民的技术培训资金较为缺乏

到目前为止，澄城县县委、县政府对农业技术培训重视程度不足，专项经费投入过少，不能满足正常的技术培训需求，无法进行全面系统的农民技术培训。虽然我县也设置了农民技术培训学校，但是资金的缺乏使其不能购置先进的教学设备，教师素质相对偏低，无法及时更新培训内容，不利于农民技术培训项目的推进。

（二）农民对提高农业技术的认识性不足

澄城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传统种植模式，现代农业起步较晚，发展未能及时跟时代接轨，农民的思想仍受传统农业结构限制，也因自身经济能力，不能较快接受现代农业新方式、新技术。在开展培训过程中，会出现培训效果不明显、农民不愿接受培训等现象，且培训对象一般为留守老人、妇女或文化层次偏低的中老年劳动力，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不强，对课堂纪律和氛围造成很大影响；很多农民都是受村委会的强制要求参加培训而不是自愿接受，缺乏学习的动力，尤其是一些追求“经验主义”的农民，仍然按照自己的方式生产，弱化了培训效果。

（三）缺乏完善的农业技术培训体系

澄城县农业发展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农业基础较为薄弱，虽然正在积极开展各类农业技术培训工作，但方式较为单一，没有形成完整的技术培训体系，很多课程的设置仅停留在理论教学，缺乏实践指导，形式

主义较为明显，农民即使参加了技术培训也不能获得实质性的技术改善。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素质就需要从完善制度方面入手，推动农业技术的推广。

二、加强农民技术培训推广的具体措施

2017 年至 2018 年，澄城县农民技术培训以加快培育发展壮大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线，针对有文化、有技能、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要求，按照“教育先行，培育主导，培训常在”的教学思路，扎实做好以职业农民培育和实用技术培训，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农业技术培训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截止目前，全县持证职业农民达到 905 人，其中高级职业农民 20 名，中级职业农民 53 名，初级职业农民 832 名。

（一）提高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素质

农业技术培训顺利开展，需要通过技术推广人员这一媒介，帮助农民更快转变传统观念，带动农民革新农业技术。对此，澄城县农技人员在技术推广过程中开展线上线下“互联网＋”培训模式，利用培训课堂＋智能设备等现代化电子设备，如：电视网络、QQ 微信群、公众号咨询服务、科技直通车等，将先进的农业技术、农业管理理念传达到全县各个角落，激发农民参与技术培训的积极性。此外，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需要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对市场趋势有敏锐的洞察力，及时转变观念，有针对性地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

（二）因地制宜安排培训项目

澄城县各镇（办）区域产业独具特色，培训课程设置与当地产业相结合，以给农民带来切实经济效益为基础，依照发展壮大苹果、生猪、樱桃产业为发展方向。截止 2018 年底，全县果园面积达到 51.96 万亩，主导产业苹果面积 38.1 万亩，产量 47 万吨；樱桃面积 6 万亩，产量 2.4 吨，水果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增值效益愈加明显。对此，我们需要针对特色产业制定全套培训项目，从果树树形改良、病虫生物防治、幼龄果园管理、量化施肥等方面着手加强培训，提高果农种植管理水平，加强果园管理，确保果园农业技术高效推广，从而带动澄城县农业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三）加大资金投入，完善设备需求

在实际教学中为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向农民学员传授浅显易懂、便于掌握的农业技术。例如，在培训中发现农民在肥料的配方、特质、种类等方面存在短板，在日常的生产过程中总是依照传统经验管理，导致收益与农业不成正比。对此，澄城县农技人员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培训方面狠下功夫，将肥料对比试验和示范样板技术效果展示给学员，以典型事例来激励他们，推动学员积极投入到农业技术学习之中，提高农业管理水平。

在培训设备配置上，澄城县共建设省级职业农民实训基地 3 个，市级 2 个，县级 10 个，农民田间学校 5 个，涉及樱桃、苹果、生猪、梨、桃、葡萄、冬枣、设施蔬菜等 8 个产业。培训基地配备电脑、投影等教学设备，同时加强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渭南市农业科技研究所等单位的合作，积极引入农业技术专业人才，组建职业农民教育培训师资队伍。

总而言之，加强农民技术培训对深化农业技术推广具有重要意义，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此，我们需要督促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与时俱进，引导农民改变传统观念，充分认识农业技术培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作者单位：陕西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澄城县分校）

“睦邻四堂间”：一种远郊闲置宅基地的活用模式

——基于上海市奉贤区调研

纪晓岚　金铂皓

摘 要：通过分析上海市奉贤区宅基地活用案例发现，奉贤区改革将宅基地盘活与农村公共服务建设融合，宅基地盘活目标由提升土地利用转变为改善村民生活，丰富宅基地改革含义；宅基地居住功能转变为养老保障、公共服务功能，转换宅基地改革思维。由于缺乏宅基地“三权分置”作为依托，奉贤区宅基地改革无法摆脱公共服务规模狭窄、宅基地盘活数量有限和维持改革持续性艰难的困境，目前仅为尝试阶段。今后，需认定宅基地资格权并调查宅基地闲置情况，促进宅基地改革与宅基地“三权分置”衔接。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持续推进，我国农村正经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的历史性变革(刘守英等，2018)。然而，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至今仍保留最初无偿获取、权利残缺的宅基地制度，在当今农村土地粘性松动、农村人口规模萎缩的市场经济中，产生宅基地闲置荒废和农村建设用地紧张的矛盾。除宅基地制度安排，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是另一项制约乡村振兴的因素。农村居住者中，老年人和儿童占绝大多数，是公共服务供给关键群体。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村无法建设匹配需求的公共服务(刘守英，2018)。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农村土地改革必要性，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丰富宅基地制度改革内容，完善制度设计；同时，关注农村公共服务短板，力求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基于此，本研究分析上海市农村宅基地活用模式，以解决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的基础性要素难题，实现闲置宅基地活用与农村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相互融合，并探讨此模式形成背景、可能路径和持续性制度安排。

一、“睦邻四堂间”产生背景

农村建设用地法学界分为宅基地、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刘艺，2010)。目前，一方面法律尚未健全，治理机制有待加强和基层民主有待完善(孙永军等，2012)，农村宅基地闲置荒废现象突出，宅基地利用率低(孟祥仲等，2006)；另一方面农村建设用地有限，偏重于发展经济效益高的经营性建设用地，而忽略经济属性较弱的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针对上述矛盾，并结合当前农村宅基地利用现状，学者提出现实倒逼宅基地制度改革，将公共服务用地来源寄托于因宅基地改革而腾换取得的建设用地，研究重点则放在宅基地退出机制和宅基地“三权分置”上。

宅基地退出机制是一项基于农村居民选择变化,促进土地节约利用的改革实验（欧阳安蛟等,2009）,我国城镇化加速初期，由于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宅基地退出机制诉求受学者关注（姜广辉等,2007）。2007 年国家批准成渝经济区作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试验区后，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方案首次于地方层面试点(国家土地

督察成都局课题组,2008)。但当时机制设计和相关配套措施均为空白。因此，学者建议起草《农村宅基地管理条例》，并建立与宅基地退出机制相配套的宅基地流转办法、耕地占补平衡、宅基地有偿使用、土地复垦、城乡建设用地统筹利用机制等制度（崔永亮，2013；彭长生等，2012;李宁等，2014）。随着理论体系完善和现实时机成熟，宅基地退出机制于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中确定为宅基地制度改革基本思路之一。

依托顶层设计，宅基地退出机制推进动力大幅增强，并培育出浙江省义乌“集地券”（朱从谋等，2017)、江苏省“万顷良田建设工程”(上官彩霞等，2014)等典型案例。宅基地退出后，将所获指标部分投入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将宅基地转变为公益性公共设施用地，此为宅基地制度改革和农村公共服务融合的有效安排，但改革试验中发现宅基地退出机制面临推进难题。从人文角度而言，由于宅基地多为早年审批获得，被农民赋予“祖产”地位，若退出宅基地，则产生背弃传统观念的偏见；从宗族地位而言，宅基地上农村自建房象征家庭发展水平（刘守英等，2018）；从理性角度而言，宅基地财产权并未取得法律、地方政府、基层组织高度重视，是农民尤其是“农二代”群体拒绝退出已荒废宅基地的首要原因(王兆林，2013)。此外，宅基地固有社会保障功能转化困难、补偿形式单一等问题阻碍宅基地退出机制顺利推行(张勇等，2016)。

总体而言，宅基地退出机制运行过程因宅基地产权权能受限，实施面临巨大挑战。基于此，充分注重农民权利保护、显化宅基地权能属性的宅基地“三权分置”探索进入改革视野。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为宅基地改革指出新方向(陈振等，2018)。宅基地“三权分置”是指稳固宅基地所有权公有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宅基地资格权，对宅基地使用权采取市场化配置。此改革思维是对马克思摒弃虚无所有但主张具体个人组成公有的个人所有制理论的灵活运用，彰显宅基地价值(严金明等，2019)。此外，宅基地“三权分置”拥有资源整合、产权明晰目标(陈振等，2018)，依靠整合将零碎化建设用地组合为完整公益性建设用地，将为建设农村综合大型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基础载体。在产权明晰前提下，可充分发挥宅基地退出机制作用，提高宅基地融合农村公共服务运转效率。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我国长期宅基地改革融合农村公共服务关键措施，目前上海市松江、温州市瑞安等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成效显著。由于宅基地“三权分置”仍属摸索阶段，宅基地使用权需审慎放活，无法快速扩大试点范围；此外，上海市奉贤区等沿海发达地区，提升农村公共服务需求强烈，但处于试点范围之外。面对改革稳健性和居民需求急迫性矛盾，奉贤区需在不变更宅基地权属前提下，探寻宅基地改革与农村公共服务提升融合的思路。

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一方面，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奉贤中心城镇或上海市中心。2017 年，奉贤区已培养职业农民 556 人，推动农民职业化，继续推动农地经营权流转工作，全面铺开“合作社农场”的规模经营模式。截至 2017 年末，奉贤区农户委托流转农地面积达 18.02 万亩，农地经营权流转率达 79%。奉贤区农村经济结构已发生从“每家每户自给自足”到“农业职业化运作”的质变，加速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另一方面，奉贤区位于上海市南部远郊，距市中心 40 公里，宅基地自建房闲置率居高不下。在青壮年流失率高、外来人口吸引力低背景下，逐渐失去劳动边际产出优势的老年人口成为农村居住主体。2017 年奉贤区户籍老年人口总数为 17.3 万人，占比达 32%，属于严重老龄化地区。考虑到该统计口径包含奉贤区城镇，而我国城乡老龄化水平相比经济发展存在倒挂，当地农村老龄化程度可能更高。因此，提高农村常住人口公共服务，促进农村老龄群体健康养老，是规避农村老龄人口贫困、健康、照料、社会和制度 5 大风险的关键举措（陆杰华等,2018）。

基于理论和现实背景，奉贤区近年开展一项以不变更宅基地权属为前提，以盘活宅基地利用为手段，以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为目标，名为“睦邻四堂间”的改革尝试。本研究基于奉贤区案例分析远郊地区以闲置宅基地作为公共服务载体，剖析该模式创新优势和潜在弱点，并展望其未来发展。

二、“睦邻四堂间”的运营特点

（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睦邻四堂间”的现实推手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矛盾已发生变化，不再局限于物质文化需求，而扩展到美好生活的需要；生产力发展不能仅考虑数量，更需要注重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此点如实反映在奉贤区农村变化上。依据奉贤区各年度统计年鉴显示，从 2007 年起，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 10 年同比增长超 10%，且高于城镇同比增速；收入结构由过往单一构成转变为工资性、家庭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多种结合组成，且后三项占比总和在 2017 年已接近 30%，收入方式呈现多样化。物质生活得到明显满足，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却相形见绌。从纵向发展角度看，以养老事业为例，在 2012 年，奉贤区养老机构场所达 30 家，直至 2017 年末，养老机构数量 34 家，仅可提供 6327 张床位，与奉贤区高度老龄化现状极不匹配；从横向发展角度看，以医疗事业为例，2017 年，城镇基层医疗机构在岗人数达 2258 人，而农村卫生室人员仅 341 人，城乡发展不平衡。面对公共服务日渐走高的需求和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奉贤区各级政府、村两委、企业党建部门等达成加速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共识，为合作奠定基础。

（二）奉贤区“乡贤”历史传统：“睦邻四堂间”的民间基础

奉贤区具有推崇儒家思想、信奉贤人的文化传统，因而得名“奉贤”。在奉贤乡村，德高望重、备受百姓依赖、尊敬的村民，则被推举成为“乡贤”。随着城市化和奉贤农业职业化的浪潮，大量原本居住在奉贤农村的“乡贤”进城务工，并依靠自身努力站稳脚跟。“乡贤”集体怀有回馈家乡情怀，也乐意助推农村公共服务的提升。在奉贤区倡导宅基地闲置活用之后，“乡贤”纷纷表态愿为盘活闲置宅基地尽力。“乡贤”与农村百姓具有血肉联系，是连接政府与村民间的桥梁。

结合奉贤区历史传统和实际现状，当地初步确立以“乡贤”拥有使用权的宅基地上的自建房为载体，以各党支部合作为手段，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而以该形式盘活的农村闲置宅基地自建房，被命名为“睦邻四堂间”。

（三）需求导向：“睦邻四堂间”的建设指南

调研发现奉贤区农村公共服务主要问题为：第一，80 岁以上高龄老人比例高且逐渐丧失自理能力。奉贤区常住老年人口占农村常住人口 10%以上，该群体人地粘性极高，其子女进城务工，代际分化开启。第二，农村失能失智群体比例大，该群体无法融入城市，被迫留守农村；第三，调查区内人群孤独感强烈。由于城市化形成的代际分离，导致老年群体缺乏子女陪伴，留守儿童缺乏父母关怀。

综上所述，“睦邻四堂间”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的重点，即提供高龄老人、失能失智群体生活助餐，降低农村老年群体孤独感，共建和睦大家庭。

（四）多方合作：“睦邻四堂间”的改建措施

由于宅基地自建房常年闲置与荒废，加之缺乏相应的硬件设施，无法直接使用。自建房改建措施：一是区级层面统筹安排，动员相关企业、社会组织参与“睦邻四堂间”建设，提供屋面翻新资金支持；二是镇级和村委提供日常运营经费支持；三是企业以认领方式，配套服务一定数量“四堂间”，并提供相应设备支持。如南方集团为所认领的“四堂间”配备电视机、空调等家用电器；四是离乡致富的村民自愿提供物资支持。

（五）主次分明：“睦邻四堂间”的运作模式

“四堂间”包括助餐的饭堂、休闲的客堂、学习的学堂和议事的厅堂。根据需求导向，奉贤区各地村委将宅基地自建房内更多面积改造为饭堂、厨房和客堂。相比主要承担休闲娱乐功能的客堂，助餐的饭堂管理难度更高，为此奉贤区各级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饭堂运营。一是所有饭堂均设置在自建房一楼并配备无障碍设施；二是建立梯度经费管理制度。在农村居民乐意选择饭堂解决基本餐饮前提下，经过村委会确认，按照年龄为分类依据梯度收费。当前各村普遍收费方式为，75 周岁以下人口每餐收费 6 元，75-90 岁人口每餐收费 3 元，90 岁以上人口村里负担。三是建立“点长”制度，推荐由常住农村的“乡贤”担任。“点长”一方面配合镇政府、村集体，确保饭堂食材来源安全，另一方面维护饭堂运营秩序，管理饭堂经费，接受村民监督；四是成立“巾帼志愿者”团队，主要由已退休常住农村老龄女性组成，主要工作为挑选食材并烹饪加工（部分村庄由镇里统一供应餐饮），对失能失智等群体提供上门助餐服务。

（六）“睦邻四堂间”初步成效

从闲置宅基地改革而言，“睦邻四堂间”将原本荒废的宅基地成功盘活，土地得到合理利用；从公共服务角度看，“睦邻四堂间”解决了高龄老人与失能失智群体基本饮食难题。以需求为导向的项目建设，实施时间虽短，但居民广泛认同。以奉贤区庄行镇为例，将“睦邻四堂闯”作为养老服务模式的村民，是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村民总数的两倍。部分村庄“睦邻四堂间”还提供免费理发、补鞋修伞等便民服务，成为奉贤区村庄综合公共服务聚集点。旺盛需求、高效盘活土地和高度认同促进了“睦邻四堂间”建设，奉贤区计划每年建设“睦邻四堂间”数量不少于 20 间。

三、“睦邻四堂间”的现实意义

（一）丰富宅基地改革内涵

我国宅基地制度改革因无法找到宅基地管理和村庄自治平衡点，效果不佳（刘守英等，2018）。奉贤区大胆突破过往宅基地改革只求提升土地利用率的单一性目标，将以人为本的自治核心纳入宅基地改革中，充分考虑村民需求之后推进宅基地改革，形成复合性目标，改革更有成效。在改革中，奉贤区不仅发挥了宏观层面的力量，同时基于长期村庄自治的特点，注重村庄基层自治的“能人贤人”带领作用，同时考虑村民诉求，拓宽了实施改革的主体，降低了宅基地改革在农村推进的难度。与以往宅基地改革集中在宅基地退出机制、宅基地产权改革等领域相比，将闲置宅基地盘活与农村公共服务尤其是养老服务结合，丰富了一种宅基地改革内涵。宅基地改革不再仅是一个乡村振兴的独立环节，既能盘活闲置宅基地，又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按照“睦邻四堂间”的模式，宅基地改革成为以改善村民生活为核心，政府、村委、“乡贤”、常住村民共同参与，最终实现村庄振兴的新尝试。

（二）转变宅基地改革思路

在已往宅基地改革中，无论是情感上呼吁进城务工者返乡居住，还是吸引外来人口入村租住，均未摆脱对宅基地自建房居住功能的依赖。实际上，由于人地粘性降低的不可逆性和远郊地区的区位级差效应，远郊宅基地的居住属性弱化无法避免(赵渺希等，2018)。奉贤区的改革使宅基地公共服务功能、养老保障功能彰显，充分挖掘了已往宅基地被大众忽视的潜在功能。奉贤区在农地社会保障功能逐渐弱化的大背景下，突破宅基地的传统功能，为农村宅基地改革提供了新思路。

（三）“睦邻四堂间”是一项产权不变更的宅基地改革

土地产权是最基础制度安排，也是农民高度重视的权利。在宅基地“三权分置”之前的宅基地管理改革中，一旦涉及产权的界定、变更、注销等，经常发生产权纠纷导致改革受阻（刘守英等，2018），直至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启动，才发生显著变化。作为非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的奉贤区，以“睦邻四堂间”化解了改革稳健性和居民需求急迫性的矛盾。在改革中，“乡贤”自愿提供的宅基地未发生产权变更，宅基地所有权仍属于集体，使用权仍属于农户。由于不存在产权变更，村民前往“睦邻四堂间”助餐休闲，抵触情绪较少，是“睦邻四堂间”短时间内顺利运营，获得常住村民认可的主要原因。

四、“睦邻四堂间”面临困难

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不完善，“睦邻四堂间”在启动和运行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睦邻四堂间”使用功能存在局限性

“睦邻四堂问”土地来源于“乡贤”原有宅基地，面积有限。在运行过程中，由于服务对象多为行动不便老年人或失能失智人群，农村自建房未安装电梯，二楼及以上区域除用于村民议事、邻里调解等外无法充分利用，仅自建房一层实现居住向服务功能的转化。另外，受面积限制，“睦邻四堂间”功能被局限在助餐、休闲等基础服务，医疗、卫生等功能无法发挥。依靠宅基地“三权分置”，在保证农户宅基地资格权前提下，开展宅基地使用权内部流转，实施土地资源整合归并，才能建设大规模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二）闲置宅基地盘活数量有限

从供需角度而言，由于“睦邻四堂间”功能的局限性，无法将农村宅基地自建房全部改建为公共服务场所，供过于求产生资源浪费；从财产保护角度而言，由于土地财产界定、配置模糊，农民担忧改建后宅基地产权归属问题，大部分村民仅愿意作为“睦邻四堂间”使用者而不愿成为服务者，可供盘活的宅基地仅限于“乡贤”提供，且不超过总体闲置面积的 10%；从地理位置而言，考虑村民往返“睦邻四堂间”通勤便利度和村委会治理难度，偏僻的宅基地不在盘活范围内。解决上述问题，供需与财产问题的解决思路与第一点类似：确保农户宅基地资格权稳定前提下，将各宗宅基地整合归并，形成大型公共服务场所；地理位置异质性问题，其他地区的改革经验显示，宅基地用益物权指标化是理想解决方案(谭荣，2018)，这同样需要依托宅基地“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

（三）“睦邻四堂间”可持续性问题

按照预先设计，“睦邻四堂间”的经营模式为“政府补一点、村委出一点、企业捐一点、个人付一点”，实现“睦邻四堂间”可持续运营。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企业支持仅停留在修建时期，正式运营后，由于资本下乡的障碍和宅基地用益物权属性未显化，企业不可能获得“睦邻四堂间”股权，投资缺乏动力；在个人层面，每餐饭堂收入是“睦邻四堂间”主要收人来源，但低于高达 3 万元以上的年运营成本。因此，四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理想模式变成仅依靠政府和村委两大主体支撑的简单经营，投资主体明显收窄，直接影响运营可持续性。事实上，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依靠常态性的公共性营造(芦恒等，2019)，“睦邻四堂间”项目长期可持续运营问题尚待解决。

五、“睦邻四堂间”的未来展望

一是做好“睦邻四堂间”从属宅基地的资格权认定。在“睦邻四堂间”改革中，“乡贤”让渡宅基地产权的程度同样是复杂的难题，须由村委会与“乡贤”进一步协商。如“乡贤”未放弃宅基地资格权，仅自愿让渡宅基地使用权，应将“睦邻四堂间”从属的宅基地资格权，确权于“乡贤”一户，保障“乡贤”权利；如“乡贤”愿意让渡宅基地资格权与使用权，应按照宅基地退出办法，有偿补贴“乡贤”，显化宅基地用益物权，防止以“自愿奉献”的名义，变相要求村民无偿退出宅基地，保障农户利益不受损。二是调查各村内宅基地闲置情况，了解村民盘活意愿。由于供求调节、地理位置等原因未能成为“睦邻四堂间”的闲置宅基地，将成为未来宅基地“三权分置”开展后重点盘活对象。

（本文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纪晓岚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厅)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卢继传

副 主 编：辛 梅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3366 59195293

010-66117652 57206299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